

全球對話

15.2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三期, 以多種語言刊出

印度社會學

Rajesh Misra
Maitrayee Chaudhuri
Indira Ramarao
Arvinder Ansari

激進化的主流

Sabrina Zajak
Emanuele Toscano
Anna-Maria Meuth
Terri Givens
Damla Keşkekci
Pasha Dashtgard
Andrea Grippo
Sumrin Kalia
Roberto Scaramuzzino

理論觀點

Anaheed Al-Hardan
Julian Go

議題開講

- > Darcy Ribeiro 與來自南方的全球理論
- > 德國反猶太主義的工具化與對巴勒斯坦團結行動的多重壓制
- > 破碎的城市: 對伊朗反女性都市主義的批判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5卷/ 第2期 / 2025.8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編輯的話

為

本年度第二刊打頭陣的，是以印度為焦點的專題！印度是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社會學界之一。在本期的印度社會學專題中，五位來自印度的頂尖知識份子，探討了不同面向的議題，例如本土社會學與西方社會學之間的緊張關係、人們為去殖民化思潮的持續付出、印度社會學的歷史發展與地域性，以及女性主義與社會運動的影響。藉由討論這些印度的核心議題，我們向成立於1951年的印度社會學學會致敬，該學會將於2025年12月舉辦第50屆年會。

本期的核心專題，主要討論極右派的正常化。本專題由 Sabrina Zajak、Emanuele Toscano 和 Anna-Maria Meuth 策劃，這七篇文章指出，極右勢力已經成為「新常態」。他們刻意將這種趨勢描述為「激進化的主流」，指出專制、性別主義、種族民族主義、反移民、反權利、反多元主義意識形態的廣泛正常化。作者分析了極右勢力如何採取極為多元且不段演進的策略，並藉此取得正當性、重塑政治與文化環境。他們探討極右政治在歐洲政黨體系中如何正常化、數位平台在極端主義內容主流化中的角色，以及男性自我提升的激進化。極右派與時尚的接觸，被分析為認同形成與意識形態擴散的微妙且有力的工具。此外，文章中也深入探討極右勢力如何在全球與地方化的背景下滲入公民社會，以及民粹主義政權如何為了貼合專制與排他議程，而重構了公民空間。

在「理論觀點」中，巴勒斯坦社會學家 Anaheed Al-Hardan 和美國社會學家 Julian Go 指出，反殖民思想是批判性社會理論的重要根源。他們認為，反殖民抗爭挑戰了帝國主義認識論最初的概念與見解。他們提

出，與其讓批判植根於地理認同，不如以反殖民主義立場，作為異己理論 (dissident theory) 的基礎。

最後的議題開講，則以三篇涉及不同主題的論文為本期刊物總結。第一篇文章重溫巴西思想家 Darcy Ribeiro 的遺緒，以及他對全球社會學的貢獻。第二篇文章由德國的脈絡來分析加薩戰爭，並討論反猶主義的工具化、異己者的沉默，以及在學術和公共領域中，針對巴勒斯坦的聲援，如何受到各種形式的打壓。最後一篇文章，則批判了婦女如何在伊朗都市空間的製造過程中被沉默。

Global Dialogue 的創始編輯 Michael Burawoy 不幸過世，本刊的下一期，將會以紀念他為主題。如果您想要投稿或給予建議，歡迎與我們聯絡。■

Breno Bringel，《全球對話》編輯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發佈於[官方網站](#)。

> 投稿請寄信至 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編輯團隊

主編：Breno Bringel.

助理編輯：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編輯：Christopher Evans.

執行編輯：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區域編輯團隊

阿拉伯世界：(黎巴嫩) Sari Hanafi, (突尼西亞) Fatima Radhouani, Safouane Trabelsi.

阿根廷：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sio.

孟加拉：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Bijoy Krishna Banik, Mohammad Jasim Uddin, Shaikh Mohammad Kais, Abdur Rashid, Mohammed Jahirul Islam, Touhid Khan,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Rasel Hussain, Ruma Parvin, Yasmin Sultana, Sadia Binta Zaman, Farheen Akter Bhuiyan, Arifur Rahaman, Ekramul Kabir Rana, Alamgir Kabir, Suraiya Akter, Taslima Nasrin, Nasim Uddin, S. Md. Shahin.

巴西：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Carine Passos.

法國／西班牙：Lola Busuttil.

印度：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印尼：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rio Seto, Nurul Aini, Aditya Pradana Setiadi, Rusfadia Saktiyanti Jahja, Harmantyo Pradigto Utomo, Gregorius Ragil Wibawanto.

伊朗：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Elham Shushtarizade, Ali Ragheb.

波蘭：Aleksandra Biernacka, Anna Turner, Joanna Bednarek, Sebastian Sosnowski.

羅馬尼亞：Raluca Popescu, Răzsa-Gabriela Zamfirescu, Bianca-Elena Mihăilă.

俄羅斯：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台灣：李宛儒，郭志豪，黃翊碩，賴奕璋，林韻柔，呂道詠，李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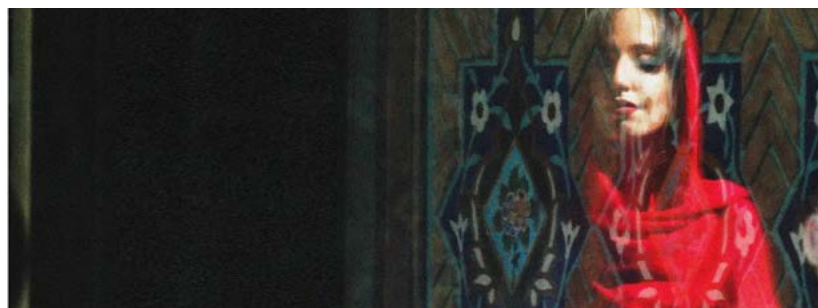
土耳其：Gül Çorbacıoğlu.



在專門討論印度社會學的專題部分，介紹了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具活力的社會學社區的一些辯論。



在極右翼勢力的正常化與激進化的主流的部分，探討了一直被貼上極右翼標籤的事物如何成為新常態。



議題開講中包括不同的主題，包括巴西思想家Darcy Ribeiro的遺著、德國背景下的加沙戰爭以及伊朗城市空間中的女性。

封面來源：Taurino，Marajó（巴西帕拉州）的漁民。
攝影：Lara Sartorio Gonçalves，2025 年。



Global Dialogue 由SAGE贊助

> 目錄

編輯的話	2
------	---

> 印度社會學

差異的對話： 本土思想與西方社會學 Rajesh Misra，印度	5
印度社會學的日常實踐： 回顧去殖民 Maitrayee Chaudhuri，印度	8
南印度的社會學 Indira Ramarao，印度	10
印度社會學中的女性： 女性主義貢獻、教育學與實踐 Arvinder Ansar，印度	12
身在印度的社會運動研究反思 Shruti Tambe，印度	15

> 激進化的主流

極右勢力的正常化與激進化的主流 Sabrina Zajak，德國、Emanuele Toscano，義大利 和Anna-Maria Meuth，德國	18
從「激進」右派到主流右派： 歐洲政黨系統的轉向 Terri Givens，加拿大	21
從邊緣到核心： 在社群媒體上成為主流的極右派 Damla Keşkekci，義大利	23

優化陽剛氣質：男性自我提升的網絡與意識形態戰場 Pasha Dashtgard，美國	26
極右派對時尚的武器化 Andrea Grippio，奧地利	29
極右翼如何侵蝕了公民社會 Sumrin Kalia，德國	31
民粹主義治理對公民社會倡議的影響 Roberto Scaramuzzino和Cecilia Santilli，瑞典	34

> 理論觀點

歷史與社會理論中的反殖民主義 Anaheed Al-Hardan和Julian Go，美國	37
--	----

> 議題開講

Darcy Ribeiro 與來自南方的全球理論 Adelia Miglievich-Ribeiro，巴西	40
德國反猶太主義的工具化 與對巴勒斯坦團結行動的多重壓制 多位作者，德國	43
破碎的城市：對伊朗反女性都市主義的批判 Armita Khalatbari Limaki，伊朗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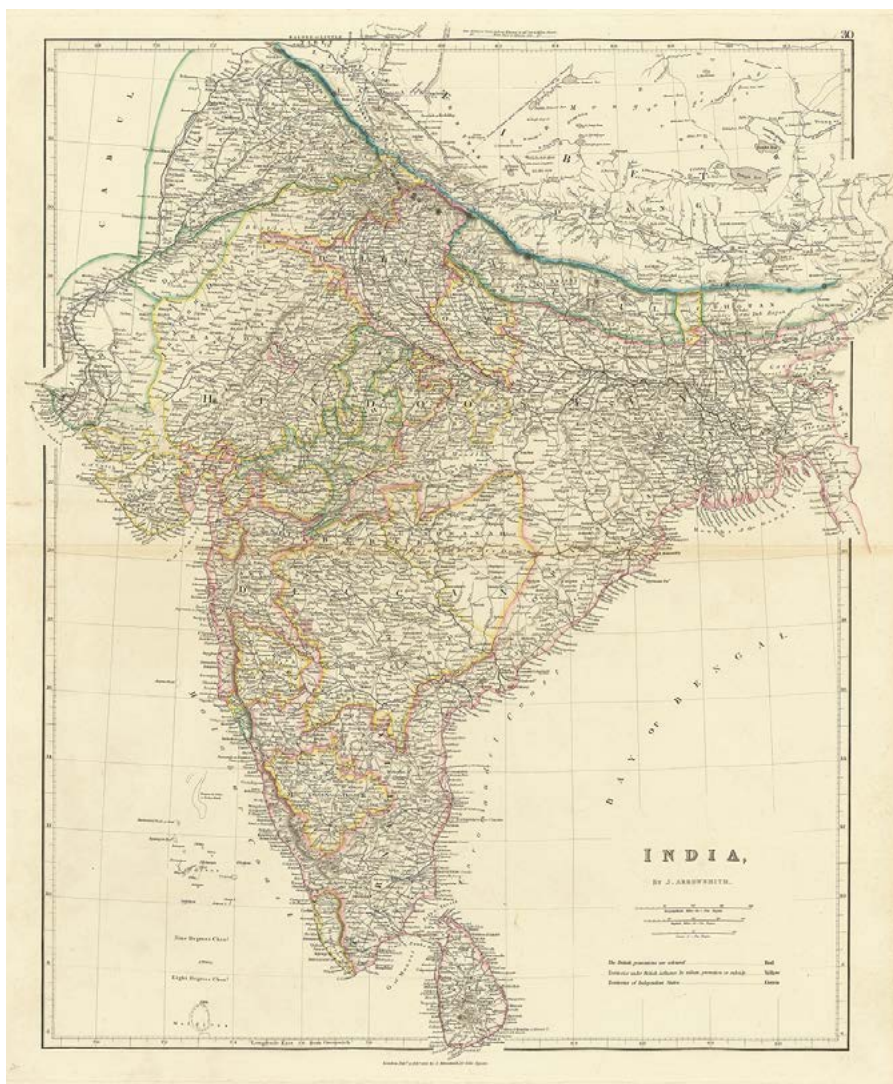
「極右派促成了某種雙向的變動——極右派正常化，以及由此導致的主流激進化。這樣的現象，反映著更廣泛的社會政治趨勢：邊緣與中心、線上與線下、極端與溫和之間的界線，正逐漸模糊。」

Damla Keşkekci

> 差異的對話： 本土思想與西方社會學

Rajesh Misra，印度勒克瑙大學

出處：John Arrowsmith，公共領域，來自
維基百科共用資源。



關於去殖民和本土社會學的討論在1990年代獲得了聲量；然而，從一開始，印度的社會學就強調了本土概念和觀點的重要性。這種重視可以追溯到兩個脈絡：首先是社會政治脈絡，其次是學術意識形態脈絡。

> 紮根於自由抗爭與西方學術傳統相互作用的社會學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在印度的發展始於20世紀初，與法國、英國和德國的經驗同步。印度第一個社會學系成立於1919年，同年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在慕尼黑大學 (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 創立了社會學系。然而，孟買大學 (University of Bom-

>>

bay)建立社會學系的計劃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914年就已制定。第一本印度社會學期刊《印度社會學家》(The Indian Sociologist)於1905年在倫敦創刊，由印度自由鬥士 Shyamji Krishna Verma 創辦，同年《社會學論文集》(Sociological Papers)發行，最終促成了1907年英國第一本社會學期刊《社會學評論》(The Sociological Review)的誕生。另一本來自印度的期刊《印度社會學評論》(The Indian Sociological Review)於1920年代由一位來自巴羅達 (Baroda) 的英裔美國哲學家創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編輯的背景迥異。印度社會學的基礎，標誌著源自自由抗爭的意識形態偏好，與西方學術傳統不斷擴大的影響之間，相互影響的動力。

儘管印度處於英國統治之下，並被強加外國信仰、課程綱要和教育系統，但1920年代的特點是重大的政治和社會變革，包括反對英國統治的政治集體意識覺醒、反殖民獨立運動、農民運動和工人罷工。這十年還見證了壓迫性的《羅拉特法案》(Rowlatt Act)和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的實施，以及像「哈里發運動」(Khilafat)、「不合作運動」(non-cooperation movement)等運動的興起，以及工會的建立。全印度工會大會 (All 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 於1920年成立，隨後印度共產黨於1925年成立。隨著自由運動在1920年代後期獲得發展勢頭，它開始動員大規模群體並領導重大抗議活動。此外，代表「低種姓」的組織開始宣示其存在，批判「高種姓」的統治地位，並在馬德拉斯立法委員會 (Madras Legislative Council) 中獲得了一些保留席位。

所有這些動員、運動和組織主要由受歐洲傳統教育的新興中產階級領導，但他們從本土遺產中汲取抵抗的活力。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的另一部分則參與了與學術和知識追求有關的職業。在這種政治動盪的背景下，將本土觀點融入人文、社會科學和政治理論的努力都可以在學術層面上看到。

> 多元哲學的悠久歷史

整個中世紀時期，印度哲學經歷了顯著的發展以及印度教和穆斯林思想的創造性融合，同時產生了虔信派 (Bhakti) 和蘇菲派 (Sufi) 運動，朝向了更加多元的文化地景。近年來，公共學者和名人將古老的見解與現有問題聯繫起來，提倡普世兄弟情誼和非暴力抗爭等思想。印度哲學的多面性代表了多種元素的豐富交織，每個元素都為人們更深入地理解存在、社會和宇宙做出了貢獻。這種遺產不僅反映了過去，也力求理解現在。它特別影響了印度社會學的發展，也更廣泛地塑造了政治和思想。

> 「為了」印度的社會學或「代表」印度的社會學

在前述的兩個脈絡下，印度社會學一直參與圍繞當時學術中心孟買 (Mumbai)、加爾各答 (Kolkata) 和勒克瑙 (Lucknow) 的本土化、脈絡化和歐洲化討論。最初，印度社會學在機構發展中處於次等的地位，與人類學、經濟學、哲學和公民學相比，常被視為一個邊緣學科。然而，孟買 (Mumbai)、勒克瑙和加爾各答

(Kolkata) 的社會學實踐旨在建立獨立的發展軌跡，採用扎根於印度現實的概念和視角，同時保留其獨特的觀點。

在這方面，可以識別出三種旨在將本土視角納入更廣泛社會學方法論的不同取徑。第一種方法是傳統主義的，完全拒絕西方社會學典範，主張印度社會的特質和不同的天性只能通過長期建立的古典哲學視角和採用本土概念來理解和描述，這些概念現在被稱為印度（印度教）知識體系。第二種方法是嚴格社會學的，側重於應用西方社會學框架和方法來概括和具體說明印度社會的特徵。第三種觀點旨在融合印度傳統的動態特徵與西方傳統，承認西方社會理論和哲學實踐的影響，同時整合印度哲學觀點和印度社會的文化多樣性。這可以從將吠陀哲學、詮釋學和馬克思辯證理論三者結合來解釋印度傳統理性的努力中來觀察。

雖然第一種方法代表了一種封閉的獨白，但第三種方法促進了本土視角與西方社會學之間的對話，創造了一種全球對話。值得承認的是，一場引人入勝的辯論在代表兩種對立觀點的印度社會學大佬之間展開：「為了印度的社會學」和「代表印度的社會學」。這場對話的焦點是社會學應該專注於印度社會的特定研究和解釋，還是應該採取更廣泛的視角，包括所有社會，而印度是其中之一。最近，有人呼籲進行一場關於後殖民的論述，這可能尚未實現。

> 本土社會學與西方社會學之間持續演進的對話

自獨立以來，本土觀點與歐洲方法論在社會科學中的整合在印度變得日益重要，這既承認了傳統知識體系和文化實踐，也欣賞了西方社會學方法在分析當代經濟變革、政治轉變和社會變革方面的有效性。西方社會學框架經常忽略印度特有的社會系統，因此強調了在後殖民的印度中將學術觀點和學科去殖民的必要性，以促進學術的自主性。在此脈絡下，印度社會學家的洞察強調了檢視文化實踐、多元性、農村社區、種姓結構、親屬關係、族群認同、種姓歧視、農業運動、社會行動主義、社會變革和經濟成長的重要性。這在獨立後的時期尤其如此，通過提出新穎的概念和模型，從歷史、文化和傳統的視角來促進對印度社會的理解。

儘管印度教知識體系獨特並與各種東方觀點創造性地融合，但西方知識體系及其實際應用無疑具有吸引力。在此脈絡下，西方社會學的主題、概念、方法和理論依然盛行，儘管有著強大的本土化和情境化傳統。可以說，本土社會學與西方社會學之間的對話一直在進行，反映了該學科的進步。

此外，全球化脈絡下的本土化進程正在演變，新興的研究領域，如達利特（賤民）研究、部落研究和性別研究，都以底層和批判理論方法為框架。印度社會學家透過提供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時的本土見解，為全球社會學做出了貢獻。儘管社會學傳統上是一門主要在西方發展並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典範影響的社會科學，但斷言印度社會學在其整個歷史中，無論是殖民時期還是獨立後，都被西方框架決定性地主導是具有誤導性的。

從社會學誕生以來，就一直有認同本土觀點和思想重要性的倡議。這一點從各種著作中呈現的多元觀點中可見一斑，這些作品有的穩固地建立在印度知識傳統的基礎上，有的在扎根於印度脈絡的同時也受到西方社會學概念的影響。儘管在將傳統價值與當代實踐和本土觀點以及全球化影響相結合的方面上一直存在許多困難，但堅持不懈的努力對於加強本土社會學和將本土洞察納入全球社會學至關重要。■

來信寄至：
Rajesh Misra <rajeshsocio@gmail.com>

> 印度社會學的日常實踐： 回顧去殖民

Maitrayee Chaudhuri，印度社會學協會主席，印度德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

在印度，社會學和人類學這兩個學科，儘管關係密切卻充滿爭議，它們的發展始於印度仍是英國殖民地的時期。因此，殖民主義與印度社會學之間的聯繫必然是深刻而複雜的。近幾十年來，出現了許多的學術研究關於[學科歷史](#)以及反殖民思想與社會理論之間的關係。

然而，在印度社會學內部，關於外來概念的限制和對本土性的追求，卻有著更悠久的辯論歷史，這一點從對《社會學報》、《印度社會學貢獻》中辯論的粗略審視即可見一斑。

在全球範圍內，關於去殖民的討論一直很熱烈；矛盾的是，這對印度這樣一個曾經的殖民國家來說，卻是相對較新的舶來品。這些發展引發人們思考的問題是：印度社會學界內部的追求，能否以該術語目前的用法，被解讀為「去殖民」？而長期堅持抵抗學術殖民主義的追求，是否意味著印度社會學家們在批判西方範疇的意義上達成了共識？

後者的答案，或許並非如此。許多早期的印度社會學家都共同關注民族建構、社會改革，以及科學的重要性。然而，另一種一直存在但長期被壓抑的學術思潮，是提倡印度獨特的文化，要求其自有的分析範疇。即使在這種主張內部，也存在著重要的差異。然而，隨著印度教民族主義 (Hindutva) 的興起，主導性的印度知識體系 (IKS) 理念才獲得了權力和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伴隨著對去殖民概念的挪用，引發了一個問題：我們該如何解讀去殖民？

> 作為「行動」的去殖民

關於去殖民的著作指出，去殖民並非單一事件；它更多關乎於「行動」，更應被理解為一個動詞，因此是一個過程。在讀到西方國家在課堂和課綱中去殖民所做的努力的後，讓我重新思考自己的教學參與。這讓我思考，去殖民是否是一個我可以在回顧中添加的術語。我借鑒了兩組經驗：在印度教授性別課程和撰寫女性主義文章；以及在印度教授社會變革概念的課程。為了進

「去殖民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以對話的語言」

一步補充脈絡，我於1970年代末進入大學學習，並於1980年代末開始在印度任教。

> 教授性別，承認女性主義

全球北方在我們日常的本土學術界中一直普遍存在。它的存在在我們的課程中是如此龐大。在1990年代初期教授一門關於婦女與社會的課程時，我對於必須從西方教科書中強制引用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基進女性主義理論感到不安。對我來說，從歷史開始更有意義。然而，只是在回顧中，我才明白為何歷史化如此重要；因為當時可用的理論框架沒有不同歷史的空間。關於多元現代性的熱潮尚未傳到我們的海岸，地區化歐洲 (provincializing Europe) 也未曾發生。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尚未成為全球北方國際化課程的附加項目。我們仍在掙扎，缺乏言語來證明我們的全球歷史是以不同的方式展開的。因此，我們的現代性是不同的，正如我們的女性主義歷史也是如此。

當我努力撰寫一份關於印度女性主義的概念性論述時，我經歷了一個從日常挑戰中學習的過程。首先是認為女性主義在印度沒有被討論的信念。回顧起來，我明白這意味著我們沒有類似於《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不幸婚姻》那樣的辯論。其次，我意識到一個顯而易見但卻經常被忽略的事實是，對於西方女性主義者而言，是否參與非西方女性主義是一個他們可以選擇的選項，但對於非西方女性主義者或反女性主義者來說，卻沒有這樣明確的選擇。對我們而言，我們進入現代性的過程本身就是透過殖民主義來調節的，正如民族主義或民主、自由市場或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或女性主義等一整套思想和制度一樣。

第三，是意識到知識流通的脈絡已經改變。在殖民主義和反殖民抗爭期間，西方／現代意識形態影響的性質是直接的政治性，與社會運動相關聯——無論是中產階級或反種姓社會改革者、民族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阿迪瓦西人（Adivasis）。他們力圖創造歷史，致力於闡明一種獨特的身份。對於婦女運動中的人來說，這通常表現為一種否認。「我不是女性主義者」這句話，經常從重要的公眾人物女性口中聽到，這引發了我們是否應該依據自我定義，還是依據她們在社會中的行動和後果來評估的問題。

第四，因此，認識到女性主義正在被討論，但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往往發生在一個脈絡中，這個脈絡既缺乏差異的論述語言，也沒有給予這種差異表達應有的政治合法性。諸如「性別建構」、「展演性」、「父權制」和「交織性」等概念，一個世紀前以不同的名稱存在。直到回顧時，大多數印度女性主義者才意識到她們是[交織性分析師](#)。

> 教導印度社會變革的概念

長久以來，印度社會學一直處於不斷追趕的狀態，緊跟著[西方生產的概念](#)。因此，即使現代化框架主導印度社會學數十年，發展被視為本土產生的概念，這樣的渴望依然強烈。我想起在許多研討會上，梵文化（Sanskritization）會被標榜為原創概念的一個例子；而女性主義和反種姓的質疑，就像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一樣，被視為學術社會學領域之外。

在我的社會學課堂上，我們學習了現代化，它是指社會、經濟和政治系統向西歐和北美發展並將在全球傳播的類型轉變的過程。我們也讀到那裡存在著文化失調，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也將發展出與經濟更進步的國家相媲美的制度，最終將導致社會的全球一致性。殖民主義則被輕描淡寫地帶過。這在一個我們從小就學習 Dadabhai Naoraji (1825-1917) 和他的著作《印度的貧困與非英國統治》的國家來說，是多麼奇怪，這本書早期批判了不平衡發展和印度的「財富流失」理論。因此，即使引進了依賴理論和 André Gunder Frank 的理論，它們也只是作為印度社會學模板的結構功能主義框架的附加項目。

現代化理論的核心啟示是「傳統結構和文化特徵」與「發展」之間的相容性／不相容性。現代印度史學家指出，雖然西方的現代化導致了城市化，但在印度，來自英國的製造產品充斥市場，導致手工織布業的毀滅，織工們隨後湧入鄉下和農業地區，陷入貧困。其中一些人成為契約勞工，在加勒比海或英屬、荷屬和法屬圭亞那等遙遠地區的甘蔗和棉花種植園工作。當我開始在印度教授現代化時，我必須擺脫對文化失調的探問，把故事弄得更複雜；並處理我們從殖民主義中遇見現代性的歷史特殊性。人們必須從抽象理論轉向歷史，這與我對女性主義的經驗非常相似。

> 結語

只有在回顧時，我才明白為何訴諸歷史細節對我們如此重要，以及為何全球南方的「行動歷史」就是「理論的歷史」。我們的故事並不存在於現有的理論框架中，因為反殖民運動和思想在主流社會學中一直被隱藏。儘管對流行語和挪用的危險保持警惕，但去殖民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發聲的語言。■

來信寄至：
Maitrayee Chaudhuri <maitrayeec@gmail.com>

> 南印度的社會學

Indira Ramarao，印度社會學學會前會長，印度邁索爾大學

南印度社會學的開端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二零年代。以下將南印度社會學的歷史分成三個時段：1900-1950、1950-2000 以及 2000-2024（截至本文撰寫時）。所涵蓋的地區為印度的五個行政區：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卡納塔克邦（Karnataka）、克拉拉邦（Kerala）、坦米爾納都邦（Tamil Nadu）以及聯邦屬地朋迪治里（the union territory of Puducherry）。

> 1900-1950

早在 1915 年劍橋經濟學家 Gilbert Slater 受聘擔任馬德拉斯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之時，以社會學視角來理解社會現象的需求開始萌芽。Slater 認為，只有讓印度學生理解社會的本質，尤其是對印度農村社會有所認識，對他們的經濟學教學才算是完整的。他對印度村落的研究，以《南印度若干村落》（Some South Indian Villages）為名於 1918 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我認為這為我們今天所頌揚的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或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研究奠定了基礎。

類似的嘗試也可於 1917 年，當 A.R. Wadia 從孟買威爾遜學院前往瑪哈拉賈學院哲學系出任系主任之時。Wadia 熱衷於達到一種哲學的社會學導向，這個想法獲得 Brajendra Nath Seal 院長的支持，促使社會學成為社會哲學本科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Wadia 促進社會學研究的決定也在 1928 年成功促成了印度首個社會學本科課程的設立。南印度社會學歷史上的另一個里程碑是在 1949 年一年制社會學碩士課程的設立。

在海得拉巴歐斯馬尼亞大學，社會學本科課程設置於經濟學系，在 1937-38 學年度才獲得獨立的學科地位。而隨著 1946 年研究所課程的設立，社會學才正式成立為一個系所。到了 1956 年印度依語言劃分各邦之際，南印度也僅有邁索爾大學以及歐斯馬尼亞大學開設碩士課程。

在克拉拉邦，社會學作為一個輔修課程開始於 1930 年代；它在各個學院中開設，授課對象主要是經濟學系、歷史學系以及政治科學系的學生。同時也應注意，這些相關機構皆為馬德拉斯大學的附屬學院。

在研究領域方面，我希望特別提奧地利民族學家 Christoph von Furer-Haimendorf 所從事的研究，他在 1945 年受聘為歐斯馬尼亞大學的榮譽教授以及尼扎姆政府的顧問。他的到來不僅促成了歐斯馬尼亞大學開

設社會學研究所課程，也帶動了該邦廣大部落地區的研究工作。von Furer-haimendorf 最為人稱道的一些田野調查便是在真丘（Chenchu）、比爾（Bhil）以及拉傑岡德（Raj Gond）等部落社群中進行的。

> 1950-2000

有鑑於院系數量和研究活動方面的增長，這是南印度社會學歷史上最具活力的時段。社會學的教學興盛於各個大學乃至學院之中。大學院系主要提供碩士課程和研究計畫，而學院則提供社會學本科課程。

在 1950 年至 2000 年之間，卡納塔卡邦就有六所大學開設社會學碩士課程，而這些大學皆有附屬的學院來提供社會學本科課程。1970 年，印度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Indi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簡稱 ICSSR）在卡納塔卡邦的班加羅爾（Bengaluru）建立了其首要院所：社會變遷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Change）。

在尚未分治的安得拉邦，多達七所大學設立社會學研究所課程，而坦米爾納都邦則有十個院所開設此類課程，其中八所在大學、一所在私立學院、一所在研究機構。而朋迪治里中央大學的社會學系於 1993 年正式成立。

克拉拉邦呈現出一種特殊情況：社會學研究所課程最初設立於學院之中，直到 1969 年才首次進入大學體系。需要留意的是提供社會學研究所課程的學院竟發展出一種研究的文化，一般被認為是研究所才具有的特點。一個特出的例子是提魯沃嫩塔布勒姆（Thiruvananthapuram）羅耀拉學院的 Joseph Puthenkalam 所寫的專著《克拉拉的婚姻與家庭研究》（Marriage and Family in Kerala），被認為是克拉拉邦親屬制度的奠基性作品。

1950 年代初，南印度各個大專院校的社會學系對印度社會展開了開創性的研究。開創了印度村落專著研究風潮的 Shyamacharan Dube，以社會學系副教授（Reader）之職加入歐斯馬尼亞大學。Dube 以鄰近塞康德拉巴德市（Secunderabad）的沙彌爾佩特（Shamirpet）地區為研究對象的開創性著作《印度村落》（Indian Village）出版於 1955 年，被認為是[南亞第一部聚焦於一個村落的著作](#)。到了 1954 年，任職於芝加哥大學的美國人類學家 Milton Singer 受政府邀請來研究馬德拉斯邦當時的農村社會變遷。他針對傳

>>

「南方的社會學系 開展了對於 印度社會的開拓性研究」

統因素對馬德拉斯這座工業化城市的影響，以及梵語傳統在現代都市中心的地位所進行的研究，促成了1955年《一個偉大傳統的現代化：從人類學視角看印度傳統》（When a Great Tradition Modernizes: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Indian Tradition）這部經典之作的出版。而 M.N. Srinivas 的《邁索爾的婚姻與家庭研究》（Marriage and Family in Mysore）以及《南印度克爾格人的宗教與社會》（Religion and Society among the Coorgs of South India）兩本著作，則先後在1942年及1952年出版，這期間他正任職於孟買大學社會學系。

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卡納塔克邦的社會學系也成為承接研究社會問題計畫的重要基地，這些計畫由中央政府與各邦機構所資助。這些計畫主要專注於情勢分析與政策建議上。C. Parvathamma 關於農村貧困人口、指定種姓與指定部族之住房問題的研究，是社會學系所倡導的「為社會行動而研究」之理念的若干典範之一。

1950-2000年間，南印度社會學領域無論在大學數量還是教學課程上都達到最高速的成長。然而自2000年起，隨著高等教育的主導權從公立轉向私立，社會學的發展遂遭受衝擊。

> 2000-2024

綜觀南印度地區，雖然二十一世紀以來成立了許多新大學，但其中大多數都是私立機構。即便是在新設的公立大學中，社會學的發展也呈現下滑趨勢。卡納塔卡邦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此期間，政府創辦了三十七所大學，但其中僅有九所設有社會學系。在2000到2023年間，則有三十九所私立大學創立，然而其中只有兩所大學提供社會學課程。與此同時，安得拉邦與於2014年自其分離出來的特倫甘納邦（Telangana）分別設立了四十九所以及二十八所院校，但其中只有三所大學開設社會學課程。在坦米爾納都邦二十九所新設的私立大學中則無一提供社會學課程。同樣地在克拉拉邦，沒有任何社會學課程在2000年以後開設的私立大學中提供。然而，稍具安慰的是，學院至少還開設社會學課程。

南印度社會學的發展軌跡引發了許多需要嚴肅討論的問題。首先是關於該學科在南印度不同地區歷史紀錄上的空白。我們既缺乏對社會學發展模式的系統性紀錄，也尚未深入探討造成其走向衰退的原因。至於辨識各大學社會學系曾涉獵的主要研究領域，以及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批判性檢視，在我看來也是一片巨大的空白。許多系所毫無疑問曾有過開創性的研究，但關於這些研究的紀錄、其當下的意義以及是否曾以此為基礎進行長期追蹤研究，幾乎完全付之闕如。儘管不可否認博士研究具有一定的就業導向價值，但多數研究仍流於以學位為目的，缺乏嚴肅的學術檢討。此外，關於教學實踐與品質評估的問題，也極需要展開一番嚴肅的探討。■

來信寄至：
Indira Ramarao <ramaraogindira@gmail.com>

> 印度社會學中的女性：

女性主義貢獻、教育學與實踐

Arvinder Ansari, Jamia Millia Islamia University, 印度

印度社會學的發展深受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現代化影響。上述的歷史進程，經常與父權體制、婆羅門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持有一致的觀點，也因此更傾向於特定的知識生產方式，並經常邊緣化其他知識形式。在這些佔據主導位置的知識結構中，女性更常被視為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而不是知識生產者或理論家。只有在分析家庭、親屬關係、再生產與社會角色時，女性才會進入社會學的視野，他們在現實中的生活經驗，則被化約為了社會學論述中的分析資料。於此同時，女性社會學家的學術貢獻，則隱身於社會學的學科歷史中：他們在大學課程中被邊緣化，且未能於學術機構中取得足夠的代表性、應有的肯認與地位。這種邊緣化並非偶然，而是反映了印度的社會學領域，仍然存在著很深的結構問題，使得女性在知識體系中遭受排除。為了釐清上述問題，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相關學科的歷史，並作為女性主義者採取行動、確保女性在這些領域中的重要貢獻能夠受到重視。

在這篇文章中，我簡述了女性主義對印度社會學的貢獻，並試圖呈現女性社會學家如何促使這個學科的變革發生。我檢視了女性如何參與在教育學、方法論的發展與學術機構的領導等面向中，以及他們如何挑戰了性別主義傳統與主流社會學典範。本文討論了 Neera Desai、Vina Mazumdar、Maithreyi Krishnaraj、Sujata Patel、Maitrayee Chaudhuri 和 Sharmila Rege 等人的提出的思想，如何解構以男性為中心的知識論和制度階層。這些學者主張，應透過女性主義重新想像社會學，並在方法論中納入反身性、知識多元性與交織性。我認為，女性不僅輔助了社會學的發展，更提供這整個學科得以持續革新的重要基礎。

> 針對男性中心知識論的前沿批判， 揭露了女性遭受的系統性邊緣化

女性主義者剛現身於社會學領域中時，便批判了印度社會學早期的知識論焦點。在印度社會學剛發展起來時，學者們聚焦於鄉村研究、種性階級制度、親屬關係模式和社會結構等主題，然而這些研究經常忽略女性的經驗，並將性別分析排除在概念框架之外。女性主義學者讓性別成為了社會學分析中的重要範疇之一，並挑戰了社會學家的上述局限，改變了整個學科的關注焦點、促使人們重新想像一個研究應該如何進行。

在印度最早的一批女性主義先驅中，Irawati Karve 針對親族關係和家庭生活的創新研究，結合了人類學的敏感度與嚴謹的社會理論基礎，更細緻、包容地呈現了印度的社會結構。再加上印度女性地位委員會於1974年發表的「邁向平等」報告，以及女性運動的激勵，學者們在1970和1980年代率先制度化了女性研究，為女性主義學術開闢了空間，促進了針對男性中心知識論，以及女性在社會學界被系統性邊緣化的批判。

> 將女性主義觀點融入教學與研究

印度的女性主義學者挑戰了主流的知識論，並推動以生活經驗、反身性和交織性為基礎的教育學，並藉此重塑了社會學研究。Maithreyi Krishnaraj 在 SNDT 女子大學女性研究中心的貢獻，對於將女性主義觀點融入教學與研究極為關鍵。他提出的參與式學習方法，強調學生與社區之間的合作，鼓勵知識的共同生產。Vina Mazumdar 則是女性發展研究中心的創始主任，他在行動和學術之間架起橋樑，帶頭開展了以社區為基礎的教育和研究活動。這些活動賦予了邊緣女性權力，並將其經驗視為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核心基礎之一。1974年，Neera Desai 在 SNDT 女子大學成立了印度第一個獨立的女性研究中心，進一步將女性主義教育制度化，維繫著女性主義學術與行動之間的連結。

浦那大學 Kranti Jyoti Savitribai Phule 女性研究中心主任 Sharmila Rege 則提出了一種批判性的教育學，將種姓、階級和性別的交織納入視野。藉由 Dalit 女性的敘事與證言，他對女性主義理論和教育學帶來了激進的衝擊，不僅擴展了方法論的視野，更挑戰了主流社會學和上層種姓女性主義論述的排他方法。

Sujata Patel 和 Maitrayee Chaudhuri 對女性主義教育學的貢獻極為重要，尤其是強調了反身性是方法論和倫理的必要條件。Chaudhuri 在他極具影響力的著作《The Practice of Sociology》中，提倡在課堂空間中促進自我反思，並挑戰根深蒂固的知識階層制度。他主張方法論的多元性，並鼓勵學生運用他們的生活經驗，作為重要的知識來源。Patel 同樣聚焦於反身性、跨學科和轉化式學習。他指出印度社會學中帶有的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遺緒，批判了歐洲中心框架的主導地位，並呼籲社會學應以邊緣化群體的觀點為核心。Patel

>>>

的女性主義教育學，提倡打破知識的階級制，以促進更具包容性和社會參與的知識生產模式。

> 處境知識與交織性

Donna Haraway的「處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概念，批判了科學中虛假的客觀性主張，並提倡了以生活經驗和特定社會位置為基礎的知識論。在印度，[Sharmila Rege](#)藉由針對 Dalit 女性的研究，實踐了這個理論，推動了以 Dalit 女性主義為立足點的知識論，挑戰主流社會學與上層種姓女性主義論述，堅持將種姓、階級與性別視為壓迫的共構結構。

交織性這個由 Kimberlé Crenshaw 首次提出的概念，已經成為了印度女性主義社會學中的關鍵分析與方法論框架。[Sujata Patel](#) 和 [Mary E. John](#) 擴展其應用範圍，以解決印度脈絡中的種姓、階級、性別、宗教和地域性的特定交織問題。[Patel](#) 批判了印度社會學的殖民與婆羅門基礎，將交織研究法試圖瓦解的排除實踐清楚呈現。[Mary E. John](#) 則運用交織性的分析方法，檢視父權制度、種姓制度、公社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如何共同作用，並呼籲女性主義政治意識到這些複雜的權力結構。

> 在社會世界中定位女性主義理論

[Gail Omvedt](#) 和 [Kamla Bhasin](#) 將女性主義的實踐擴展到學術界之外，把女性主義的方法帶入草根運動和社區的學習空間。[Omvedt](#) 將女性主義理論與 Dalit 和鄉村女性運動結合，強調參與式學習與集體賦權，模糊了學者與倡議者之間的界線。他在針對參與式行動的研究中，將邊緣社群定位為共同研究者，打破了知識生產中的傳統階級制。[Kamla Bhasin](#) 透過與 [Sangat](#) 合作的女性主義教育計畫，以及他平易近人的著作，如《[What is Patriarchy?](#)》與《[Understanding Gender](#)》，將女性主義知識傳播給一般大眾。藉由說故事、唱歌和對話，[Bhasin](#) 促進了鄉村女性和勞動階級女性的集體學習和意識提升，使女性主義理論得以普及草根。

總結來說，這些女性主義方法論將納入了參與性、包容性和道德的研究實踐置於優先。他們挑戰實證主義與抽離式的調查形式，提倡反身性、處境知識與交織性。正如 [Gita Chadha](#) 和 [Maitrayee Chaudhuri](#) 所強調的，反身性要求研究者批判性地檢視自身地位，與知識生產中固有的權力關係。女性主義學者由 [Pierre Bourdieu](#) 的反身性社會學出發，提倡更深入的自我反省，將研究者置於他們所研究的社會世界中，並破除了客觀中立的主張。這些方法強調對知識生產去殖民化的承諾，並促進了連結學術與社會轉型的實踐。

> 針對女性的暴力與歧視仍然持續

然而，儘管上述貢獻影響深遠，印度的學術界仍正奮力對抗者男性主義的制度文化，這些文化往往使女性的學術工作變得無足輕重。[Chaudhuri](#)認為，性別階層制度仍然存在，其不只影響學術環境中的職業位置，更延伸至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女性的研究，尤其是涉及

「女性的貢獻 是該學科的基礎」

女性主義理論、種姓與邊緣性的研究，經常被低估，或被限制於「女性研究」領域中，難以融入主流社會學論述。[Maitrayee Chaudhuri](#) 批判了這種知識上的排除，她認為女性主義的見解往往被視為補充，而不是學科分析框架的核心。

現在的印度女性主義社會學，面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技術變遷與社會政治關係緊張等一系列複雜的挑戰。零工經濟與平臺式勞動的擴張，使得女性的工作不穩定更加嚴重，對 Dalit、Adivasi 與少數族群女性造成極大影響，他們面臨不安全的生活、薪資差異，並受到社會保護系統排斥。以上述社會變遷為前提，數位使用可及性的差異，更加強化了現有的種姓、階級和性別階層，使平等的經濟機會受限。與此同時，都市規劃與基礎建設的發展，往往讓佔優勢的族群享有特權，讓邊緣女性難以使用安全且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間。

[Bina Agarwal](#) 和 [Vandana Shiva](#) 等學者，都強調了環境退化和氣候導致的流離問題如何進一步使人們的處境更加危急，尤其對鄉村和原住民女性而言，他們的勞動是社區生存和生態永續的重要根基。此外，基本教義派、族群衝突與政治兩極化的盛行，也使得針對宗教少數族群女性的暴力與歧視，損害其權利與安危。這些相互交織的困境，讓我們更加需要透過具有反身性、交織性，並致力於社會正義的女性主義實踐，於不斷演變的世界秩序中，應對當地與全球的不平等結構。

> 擁抱多元性、提倡社會參與的學術環境， 迎向包容且具反身性的學科

女性主義學者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僅重構了印度的社會學、挑戰其男性主義的根基，也擴展了社會學的方法論、取徑與關注焦點。雖然不平等仍然以不同形式演變且持續存在，女性主義研究者至今以來的貢獻與行動，已經確保女性得以在重要學術機構——尤其是印度社會學學會——中有更大的空間甚至擔任領導者。

近年來，印度社會學的發展顯示出具有意義的制度進展，以及對包容性的重新承諾。2016年，[Sujata Patel](#) 成為印度社會學學會首位女性會長，標誌著學術界性別平等議程的重要里程碑。在任期內，他也為後續的女性領導者——例如 [Indira](#)、[Abha Chauhan](#) 與 [Maitrayee Chaudhuri](#) 教授——鋪展了道路，他們在擔任會長的期間，持續鞏固上述議程，更促進了印度社會學學會的民主化進程，推動結構不平等與促進包容性學術研究等目標。

透過對教育學、研究與制度實踐的批判性介入，女性主義學者突顯了反身性、交織性與以社會正義為核心的參與式方法論的重要性。女性領導者在印度社會學會中的貢獻，進一步讓這些變革能夠開花結果。然而，印度社會學的民主化仍未完全實現——要建立一個真正具包容性與反身性的學科，需要各種性別身分的學者積極參與。

接下來的目標，並不是要創造排除男性的女性主義空間，而是培養能讓多元的聲音協力合作的平臺，以更全面、更平等地理解印度社會。鼓勵男性學者深入女性主義視角，有助於拆解根深蒂固的階層體制，讓這個學科變得更加豐富。藉由擁抱多元、推動具社會參與性質的學術實踐，印度社會學得以邁向一個將女性主義思想與實踐，置於其知識與制度核心的未來。■

來信寄至：
Arvinder Ansari <arvinder2009@gmail.com>

> 身在印度的社會運動研究反思

Shruti Tambe, Savitribai Phule Pune University, 印度

—— 十世紀下半葉，社會運動社會學這個領域，逐漸在西方發展起來。20世紀60年代，這個次領域在廣泛流行於全球各地的社會學界，包括印度。說起來，社會運動社會學的發展，正好對上了世界各地的去殖民化時期。反殖民運動的蓬勃，與社會運動社會學的興起同時發生，這難道只是碰巧嗎？

我認為，社會運動社會學這個獨立的學術領域，正是由各式各樣的抗議活動，以及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反種族運動所促成的。可以說，社會運動社會學超越了過往的學術傳統，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了社會的變遷如何發生。可惜的是，當時的學者們，並沒有將去殖民化時期實際存在的那些方法、策略與意識形態，也一起涵蓋到這個領域的討論中。這造就的是，社會運動社會學這個學術領域，似乎完全是獨立於「殖民世界」的發展之外的。

> 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的現代無產階級運動

有鑒於社會運動社會學作為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我想在此提出三個對這個領域來說極為關鍵的假設。這三個假設，將協助我們進一步構建此領域中的學術研究觸及特定經驗的正當性。

首先，是認為社會運動是一種現代現象的這個論述。現代性的所有元素，包含思想、價值觀、政體、經濟、社會與技術的變遷，皆促使社會運動成為一種徹底的現代現象。即便這些變遷的發生起初非常緩慢，並且有明顯的地域性，但自15世紀以來，我們能夠在歐洲的各個地區，普遍地觀察到特定的智識發展過程。不管是個人主義、理性化，還是創新美學的推廣、以及科學技術的推崇，皆普遍存在於現代世界當中。這些變遷同時也促成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的改變。在殖民世界中，情況也是如此嗎？在當時的南半球，種族議題是重要的嗎？

其次，在這個領域中，針對制度化集體行動的研究，是根植於現代性、個人主義，以及西方資本主義所形塑的、自由民主國家的歧見等面向當中

「全球南方不是一個同質的類別」

的。這為西方獨有的這些經驗，賦予了真實性。亦即，這些制度化的行動，與20世紀西方自由資本主義之下的民主制度結構有關。

第三個假設，則是關於是誰領導了這些抗爭、誰又是被領導的人。在社會運動這個領域中，有一個明確的預設是，無產階級是社會運動的先鋒。抗爭強調的，是階級之間的衝突，以及由此產生的、民主社會中的社會政治與經濟改革壓力。

藉由上述假設，以及其餘的概念框架和理論觀點，全球學者對社會運動進行了研究，並凸顯了結構緊張、歧視、失去生計和民主異議等議題。延續這樣的視角，在印度甚至全球南方的社會運動中被採用的各種策略，得以被記錄下來。

> 在印度流行了六十年，但仍不屬於主流

在1980年代的印度，與社會運動、民族主義運動、農民運動和部落運動相關的研究數量急劇增加；像 Bhoodan-Gramdan 運動這類涉及土地和村莊贈予的個案研究，則藉由社會運動社會學的理论框架，記錄並分析了各種抗爭與運動。同個時期，有數篇來自不同大學的相關博士論文發表。

作為一個專業的學術領域，社會運動社會學已經流行於國際社會學界六十年之久。在南亞、尤其是印度，更有數以百萬的、沒有資源的普通民眾，參與了各種抗議、社運活動。然而，這些經驗卻尷尬地掙扎於主流社會學的社會運動論述當中。我們能否理解這個長久以來的困境，並找出指引前路的曙光？

> 印度的社會運動浪潮未能聚焦社會學辯論

[NAPM@30](#) 是一份歌頌抗爭（無論成功或失敗）的文件，其指出1990年代初人民聯盟崛起時，世界銀行就已經將結構調整計畫強加於印度政府之上。這嚴重影響了補助金、福利計劃、補貼以及成千上萬個長期工作的穩定。然而，正如 NAPM@30所述，針對福利國家的承諾，以及盛行至1980年代末的、基於憲法價值的制度結構，統治階級與那些沒有資源的、受到剝削的民眾之間，大致上達成了一個模糊的共識。

20世紀70和80年代，印度各地掀起了一股由學生和青年領導的運動浪潮，他們希望能藉由社會運動，推動印度社會的社經和政治體制的改革，並援引了反殖民族主義運動，以及憲法中所提及的、建立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等主張。其中的訴求包括：將土地重新分配給無地者、為那些在社會和經濟上被剝削的群體提供居住、給予貧困學生教育津貼、建立糧食的公共分配糧制度……等等。到了80年代中期，人們仍然相信，經過四十年的後殖民時代，印度的民主共和國必須在社會、經濟和政治正義、世俗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支持下，沿著自由、平等和博愛的道路前進，為數十億人打造公平的未來。為了達到這些目標，成千上萬的抗爭與運動在印度各地此起彼落。即便如此，社會運動在印度社會學界，僅是討論的焦點之一，但並非是人們關注的核心議題。印度社會學界的主要論辯，仍是關於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以及社會階層的概念性與物質性。

> 「新」抗爭反映先進資本主義經濟與殖民資本主義印度經濟之間的差距

大約在1980年代末期，新社會運動理論（New Social Movement, NSM）出現了，它以自1960年代以來在西方已發展世界出現的「新」運動為分析焦點，對應著馬克思主義社會運動理論中的「舊」運動。「新」社會運動的特性，是其更加關注先進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生活方式、價值觀、以及私人生活與符號領域的變遷。

當時，許多群眾運動——包括青年為就業、農夫為公平價格和土地權利、部落社區為反對流離和要求資源而發起的抗爭——正於印度的民主舞台上引起一股浪潮。政治和經濟改革等議題浮上檯面，透過收入和權力再分配來減輕貧窮現象，更成為公民社會的討論焦點。在1980年代，關於生存，以及人們如何藉由運動及工會爭取尊嚴，並擁有這樣的民主權利，是很普遍的議題。

換句話說，在印度社會運動涉及了物質衝突、公民權和人類尊嚴，而在西方社會，關於如何生存

的問題，或多或少已經解決了，引發衝突的議題，更像是身份、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等等。印度透過殖民資本主義這項途徑，成為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員，正如 Alavi 與 Shanin (1982) 所強調的，這解釋了先進資本主義經濟與殖民資本主義印度經濟之間的差距。

> 被忽視的概念與理論架構

在研究1990年代以來的社會運動時，學者們原封不動地套用了 NSM 的理論框架。其中包括被剝削的社會文化階層——獨立後被國家標籤為「在冊種姓」（scheduled castes）——運動、部落要求林地和相關產品的文化權利與公民尊嚴的運動，以及婦女運動。

迎來新的千禧年，許多尚未達成目標的抗爭活動，仍持續努力爭取物質與社會文化權利，與此同時，研究者們正使用著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理論——從相對匱乏的功能主義解釋到 NSM——來分析這些活動。

尷尬的是，一些資深的研究者，幾乎是語帶歉意地指出，1980年代印度學者在社會運動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與理論架構，可以說大多都在印度學術界遭受了忽視。一些社運人士則表示，除了少數學者之外，運動的口號、議程，以及如何實際運用特定策略，都未能在學術界引發多少討論。

> 總結全球南方的問題

如今，不同意識形態與議程之間的論辯、抗爭與多元意見，讓民主能夠以各種形式展現於當代世界。然而，如果仔細看看全球南方的情況，我們可能會開始懷疑，自己真的和他們身在同一個地球上嗎？許多深入的分析顯示，全球南方並不是一個同質的範疇。從自然資源分配衝突，到 #MeToo 等反性侵運動，從 LGBTQ 族群等身份認同運動到抗議資本主義開採、工業與基礎建設計畫造成的遷移，有些問題是全世界共有的，有些則是全球南方特有的。在這些條件下，資源、收入、權利與有罪不罰等議題所引發的矛盾與衝突，形成了複雜的全球情景。

總結來說，我提出以下問題：印度的社會運動社會學，是否未能由反殖民抗爭的不同策略——從與英國人之間的暴力衝突，到甘地領導下的非暴力社群網絡——當中，獲得其概念和理論基礎？西方的社會運動社會學理論，將民族主義理解為某種狹隘的意識形態，然而，在甘地領導下的民族主義，難道也是如此嗎？如果說真理與道德是以非暴力為根基，我們原本應該可以將印度視為在全球南方出現的、新的現代性型態的案例，並進一步探究人道

主義價值觀如何成為具更國際視野的、新民主國家的基礎。既然這樣，那我們過去在分析印度和其他南半球社會的抗爭和衝突時，是不是太過機械式地套用了西方的概念和理論框架，無意識地接受了東方主義的預設？

社會運動社會學如今急需新的生機，因此，我們必須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建立一個公正的、能夠適用於不同的社會運動現實的次領域。對於身在全球南方的我們來說又更是如此。■

來信寄至：Shruti Tambe <shruti.tambe@gmail.com>

> 極右勢力的正常化與 激進化的主流

Sabrina Zajak, DeZIM Institute, 德國; Emanuele Toscano, Guglielmo Marconi University, 義大利,
和 Anna-Maria Meuth, DeZIM Institute, 德國



圖片來源：Sebastian Christoph Gollnow
經 AI 編輯。

全球許多民主國家正在經歷其原有原則與核心價值的巨大變動：過去被標籤為極右的勢力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存在，反而成為新的常態、主流思想。族群民族主義、威權主義、反移民、性別歧視及反多元的意識形態，已佔據社會中的關鍵位置。極右勢力不僅坐擁經濟與政治菁英的位置，亦透過基層運動與社群媒體意見領袖進行動員。多年來的主流化與動員，已使極右意識形態在社會各領域取得實權，深植於許多普通男女老幼的心中，使社會逐漸轉變成我們稱之為「激進化的主流」。

> 激進化主流的概念

在本期《全球對話》特刊中，我們希望聚焦於極右勢力正常化的最新動態及其對歐洲、美國乃至全球自由民主體系聯盟架構的影響。我們將探討那些過去被邊緣化的族群民族主義觀念與言論，如何逐漸被主流話語、社會文化層面、個人態度以及政治動員與政策所採納並公開表達；並分析這一現象的形成過程。我們建議採用「激進化主流」的概念，將焦點從單純分析極右的戰術、行動者與意識形態，轉向理解主流本身如何被激進化。

我們所稱的**激進化主流**，是指透過一個日益密集的本土至全球網絡（包括政治人物、商業領袖、數位法西斯、政黨、組織、基層運動以及個人）擴散與拼湊各種意識形態，並透過不平等價值秩序重構社會與社會關係。藉由此概念，我們也希望引起更多關注一個相互關聯但迄今仍大多被忽視的過程：民主與包容性規範和原則的去正常化，以及親民主、反歧視（如反種族主義、反性別歧視）和進步力量被邊緣化的現象。

在本篇導言中，我們希望進一步闡釋「激進化主流」的概念，並指出其在國際層面的部分影響，以及對平等與自由多元民主所帶來的（預期）後果。

> 從探索到分析

當我們首次在2023年於德國柏林由國際社會學協會 (ISA) 與德國融合與移民研究中心 (DeZIM) 共同主辦的國際會議上提出「激進化主流」的概念時，我們想聚焦於一個矛盾現象。對我們而言，「激進化主流」這一概念更像是一種修辭手法與引人深思的矛盾語，因為激進與主流本是對立，或至少是無法分割的兩個概念：激進的東西不可能同時成為主流。我們將該次會議命名為「尋找激進化主流」，作為與國際知名學者討論正常化動態及其潛在危險的平台，特別是在（主流）社會逐漸激進化的情況下。

如今，我們認為不再是尋找的階段，而是該深入觀察日益激進化社會的實際現況，以及極右勢力的正常化與民主、多元與進步行動者及價值去正常化之間的動態關係。本期刊載的各篇文章提供了廣泛的實證證據。

Terry Givens 透過比較歐洲不同階段的政黨體系，探討極右勢力的正常化現象。Damla Keşkekci 則論述平台主流化的不同機制。與此同時，Pasha Dashtgard 研究了「男性圈」（manosphere）如何將男性自我提升的網絡轉變為意識形態的戰場，展示了身體與陽剛氣概的優化如何成為激進化的機制。受到更廣泛文化轉向的推動，極右行動者也日益利用時尚作為策略工具，以建構身份、傳播意識形態，並在主流文化表面下正常化極端敘

事。Andrea Grippo 展示了跨世代的極右美學策略如何演變——從明顯的次文化風格到諷刺且過度正常化的時尚——將美學武器化，作為政治滲透與文化合法化的載體。最後，Sumrin Kalia 揭示了極右勢力如何透過多種機制侵蝕巴基斯坦及其他地區的公民社會，而 Roberto Scaramuzzino 與 Cecilia Santilli 則分析了民粹治理重塑公民社會的多樣方式。

> 聚焦於話語轉變

那麼，這裡與現有關於極右及極右動員的研究有何不同呢？

大量研究與文章聚焦於支持極右政黨的選民（多為男性，涵蓋各個社會階層）以及其崛起原因，特別是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這些原因包括應對快速現代化的經驗、社會不平等、不安全感、政治環境與代表制度的變化、多重危機、戰爭及疫情等因素。另有研究則聚焦於社會層面，探討極右崛起作為社會動員的結果。

正常化觀點探討族群民族主義者與意識形態如何被社會主流所採納，並在政治、文化及話語層面擴散。理解與描述政治議程向右轉變及其對民主社會造成的影響，是此觀點的核心焦點。許多專家與學者強調，對民主制度與價值的攻擊，往往是從民主體制內部進行，並劫持其制度與價值。

分析重點在於話語的轉變：正常化可以透過過去由右翼行動者使用，且如今已進入主流話語並被視為常態的詞彙來追蹤。此過程可能導致政治辯論與文化的轉型，以及公共領域的結構性變化。社群媒體平台在此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加速錯誤資訊的傳播並放大激進行動者的聲音，尤其是在仇恨言論不再受到管制的情況下。這進而促成具體政策，例如限制庇護法規、強制邊境管控，或影響性別自我認定的相關法令。

> 人類不平等價值的意識形態為 基於歧視的階層體系提供正當性

正常化因此超越了對極右的傳統研究，而強調民主主流內部行動者的角色。「激進化主流」的概念基於並整合了這些洞見。但我們並非聚焦於從極端邊緣至主流的「單向路徑」，而是揭露主流的所有矛盾與複雜性，在此，既有的意識形態、世界觀與實踐，與極右行動者及其意識形態相互交織融合。民主的理念、價值與實踐不僅被解構，更被推向邊緣。

總體而言，我們將激進化主流定義為一個日益密集的行動者、機構與媒體網絡，儘管未必正式隸屬於極右政黨，卻採用或傾向於使用曾屬於激進政治團體的話語與立場。

我們將主流視為一個高度異質性的現象：涵蓋來自不同領域、擁有各種立場與背景的多元社會行動者，他們在各種情境與多種原因下，容納、認同、辯護並正常化極右意識形態、行動與態度。相對地，激進化指的是一系列從言論到行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透過宣揚人類價值不平等的意識形態，來正當化並加劇基於種族、性別、極端民族主義及歧視的階層體系；排斥模式煽動仇恨與暴力，甚至可能導致個人或群體的謀殺行為。

> 複雜的地方、國家與國際層面後果

這影響到所有社會領域：政治、文化、商業、公民社會及公共領域，涵蓋個人、組織與制度層面。在此背景下，極右勢力的正常化既可視為一種社會接受的過程，也是一種制度化的現象。

在此背景下，若僅專注於激進化的選舉面向、極右動員或主流話語轉變，將有可能對現象產生扭曲的解讀。相反地，我們需要探究複雜的相互作用、矛盾、模糊的界線與意識形態的拼湊，這些因素將原本和善的鄰居、朋友或家人變成無知、仇恨或暴力的執行者。如此一來，也讓我們得以更深入了解民主與進歩行動者、理念與實踐被去正常化與邊緣化的機制。對自由民主的根本影響變得顯而易見：民主理念從社會生活的地方性、國家性及全球性組織原則，縮減成為越來越零散的、由集體組織的平等、團結與希望所組成的孤島。

我們僅舉出少數激進化主流在地方、國家與國際層面的影響例子。在許多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中，社會運動與進步公民社會組織，包括勞工運動、婦女運動、LGBTQI+運動、氣候與和平運動以及巴勒斯坦聲援運動，甚至親民主運動，日益遭受刑事化、噤聲與打壓。封閉邊境及對難民的嚴格入境限制，惡化了流離失所者的保護與安全狀況——無論是在他們的逃亡路徑上，還是在行使庇護權利方面。強大產業對氣候目標的漠視影響全球氣候，因為氣候無國界也不受國家利益限制。

國際體系同樣面臨嚴重威脅。曾經是和平與反法西斯堡壘的歐洲聯盟，是否能抵抗來自內外激進化主流的壓力，尚未明朗。聯合國所維護的人道主義理念遭到質疑，資金被撤回，威脅到全球依賴人道援助的數百萬生命。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削弱了過去數十年發展出的多邊主義，以應對與管理全球性問題。這種情況在貿易、氣候、移民及安全聯盟等領域的談判抵制或退出既有協議中表露無遺。在貿易領域，透過提高關稅與（威脅）貿易戰，保護主義經濟政策正逐步推行。

> 民主的更新與再造研究議程

這些僅是激進化主流新常態如何已經並預期將繼續促成對人權與民主的保護、執行、尊重與能見度侵蝕的少數例子。若我們想阻止並逆轉主流的激進化，我們深信需要透過嚴謹的實證分析與跨國比較，更深入理解主流激進化的機制。理解主流如何被激進化，最終有助於發展去激進化的理念，探尋「希望願景」，使民主的價值、實踐與社群得以恢復、重生與更新。結合極右正常化與民主去正常化的動態，應成為未來研究議程的核心，從而助力民主的更新與再造。■

來信寄至：

Sabrina Zajak <zajak@dezim-institut.de>

>>

右派政黨逐漸在政黨政治環境中，由邊緣轉變為主流。考量到上述社會變動，我們必須時刻謹記如今政治環境的脈絡。

> 本世紀激進右派支持率漸增

2000年代初以來，幾乎在歐洲的每次選舉中，激進右派政黨在立法選舉中的支持率都是增長的，其明顯成為主流政治的一員。2022年9月，瑞典民主黨以73席成為瑞典國會第二大黨。在法國，國民聯盟黨在2024年的立法選舉中獲得37%的選票，但在左派政黨的策略性合作下，他們並未獲得預期的議席數。在德國，德國另類選擇黨更於2025年2月成為第二大黨，贏得近21%的選票，比2021年的得票率增加了一倍。

2022年以來，已有數個右派政黨，在選舉中成為得票率最高的政黨，例如新法西斯政客 Giorgia Meloni 的聯盟「義大利兄弟會」便贏得了足夠票數，帶領義大利組成政府，Meloni 則成為總理。在荷蘭，Geert Wilders 率領的自由黨在2023年11月的選舉中贏得最多議席，由於聯盟談判的爭議，政府直到2024年7月才成立，由一位獨立公務員擔任首相。Viktor Orbán 自2010年起在匈牙利掌權，他的非自由主義政府，一直是歐盟的眼中釘。

> 民粹主義的吸引力、種族主義及 對少數族群的恐懼，促使勞動階級 對右派的支持度與日俱增

雖然說，極右派或激進右派政黨不被認真看待，也不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不過現在，他們已經從永遠的反對派，變成認真競爭政治權力的角色。自我1990年代中開始研究激進右派以來，種族與移民政治議題的相關規範已經有明顯的改變。1999年，Joerg Haider 率領的自由黨，在奧地利立法選舉中名列第二，當時其他十四個歐盟國家，都認為他的移民和歐盟議題立場太過極端。儘管他們無法改變投票結果，但仍採取措施表示自身立場，比如在2000年通過種族平等指令、[表達對反歧視政策的支持](#)。歐洲的激進右派政黨，經常利用民粹主義號召，辯稱他們是站在「一般人」這邊，並且反對菁英階級。他們普遍傾向於威權主義，呼籲保護國家安全、防止外人入侵，並期望人民盲目地信任政黨或政治人物的領導。另一個因素，是種族主義以及對少數族裔和移民的恐懼，歐洲的政治人物利用這點，來動員那些害怕失去特權，並最終失去政治支配地位的選民。

21世紀初以來，研究者發現，極右候選人在勞動階級選民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一個重要發展，是中間偏左派政治人物的成功，如美國總統 Bill Clinton、英國首相 Tony Blair 和德國總理 Gerhard Schröder。這些人奉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支持更為個人化的治理方式。這些政策整體上促進了經濟成長，但對改善勞動階層的薪資或福利，卻沒有什麼幫助，反而擴大了財富不平等。如果中間偏左派的經濟政策能夠改善勞動階級選民的生活水準，他們很可能就不會對激進右派抱持這麼開放的態度。可惜的是，當時薪資水準停滯不前，工會會員人數更隨著製造業職位的減少而下降。

> 未來何去何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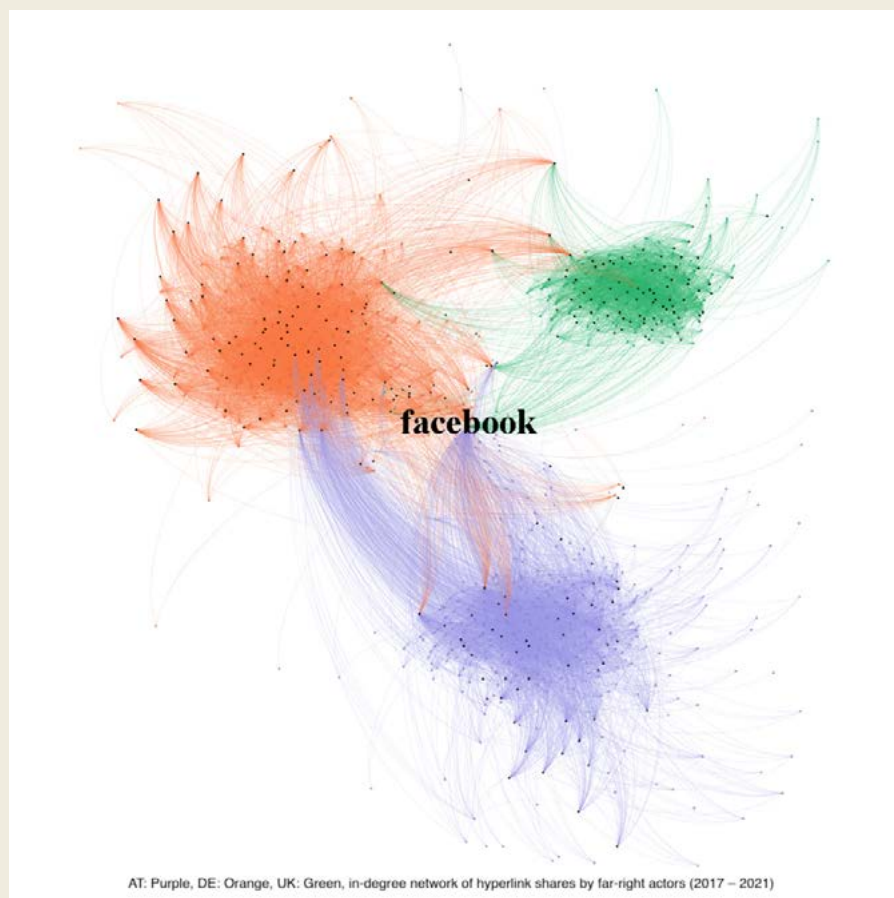
政治局勢不斷變動，在歐美國家，非自由的政治勢力持續得勢，這確實很容易讓人對民主的前景感到悲觀。我們仍然期望右派的政府能夠維持民主的存續，也希望選民能夠支持那些更明確體現民主精神的政黨。民主論述是否能夠回歸主流，並重新成為選民的支持對象？只有時間能回答這個問題。與此同時，研究人員需要繼續進行量化與質性分析，試圖理解並解釋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如何促成選民與政黨之間的互動關係。■

來信寄至：
Terri Givens <terri.givens@ubc.ca>

> 從邊緣到核心：

在社群媒體上成為主流的極右派

Damla Keşkekci,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義大利



奧地利：紫色；德國：橙色；英國：綠色。
極右翼行為者 Facebook 頁面上共用的超連結
程度網路（2017-2021 年）。
圖片由作者生成。

度處於政治場域邊緣的極右派行動者，如今正一步步地試圖重返政治主流，並將自身定位為正常的、具正當性的政治勢力。我們與 Liriam Sponholz 一起在「[激進化西歐主流](#)」的研究中，探討德國極右勢力（由政黨、另類媒體與社會運動等各種行為者組成）如何在 Facebook 上策略性地使用超連結。我們分析了 100 個 Facebook 公開粉絲專頁上共計超過十二萬篇的文章（2017-2020 年），呈現出社群平台的運作如何形塑政治溝通，並促成「平台主流化」（platformed mainstreaming）。

我們歸納出三個極右派勢力的推動前述目標的關鍵機制：（1）建立並維持網絡，藉此將自己塑造成「正常」的人；（2）透過分享主流媒體的資訊，來「借用」其正當性；（3）適應平台限制，以繼續傳播他們

的訊息。藉此，極右派促成了某種雙向的變動——極右派正常化，以及由此導致的主流激進化。這樣的現象，反映著更廣泛的社會政治趨勢：邊緣與中心、線上與線下、極端與溫和之間的界線，正逐漸模糊。

> 社群平台的邏輯與超連結的策略性使用

極右派行動者不只會透過社群媒體進行日常消遣。他們在摸索、逐漸適應社群平台運作邏輯的同時，也嘗試克服平台的限制。舉例來說，Facebook 的運作邏輯，是透過參與度來獎勵能見度。越能讓使用者按表情、留言或分享的內容，越會被推廣至其他使用者的動態消息中。於是，超連結便成為了強大的工具，其能夠傳播意識形態一致的論述，並連結更多極右派行動者。

超連結的策略性使用，是極右勢力於平台上主流化的重要元素。極右行動者主要使用超連結來維繫網絡、自我宣傳和擴大聲量。值得注意的是，極右派的另類媒體，如部落格 Tichys Einblick 和俄羅斯贊助的網站 Russia Today DE (RTDE)，皆是以「超級分享者」(super-sharers)——以少量的網域來源，轉貼並分享成千上萬的連結——的形式運作。其他極右行動者，例如政黨（如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和社會運動（如 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 PEGIDA），則作為「超級傳播者」(super-spreaders)，以更廣泛的來源散播這些連結。分享連結的行為，不僅強化了 Facebook 上極右生態系統的內部連貫性，也有助於重塑其公共形象。

> 策略的轉變：以能見度而非病毒式傳播為主要考量

極右行動者的社群媒體策略，並不只是追求透過資訊的轉貼與分享達成一夕爆紅式的病毒性傳播 (go viral)。他們更關注的，是如何持續地讓這些資訊在社群平台上保持能見度。這正是平台主流化的關鍵，其驅動力不僅來自極右勢力的意圖，也來自社群媒體的規範。Facebook 等主流平台在此過程中扮演著矛盾的角色，它們既是把關者，也是協力者。諷刺的是，即便他們的平台規範以限制和防止極端主義內容為宗旨，最終卻可能促成極右主義的正常化。

在 Facebook 的劍橋研究院醜聞後，2018 年發生的去平台化風潮，使得許多極右行動者離開了 Facebook。不過，它仍是使用量最大的社群媒體，且仍然有大量的極右派使用者。在研究中，我們觀察到 Facebook 上極右行動者的數量，在調查期間沒有什麼變動。換言之，Facebook 對德國極右派來說，仍然是極為重要的。

> 隱微的框架與自我連結， 維繫了極右派行動者的能見度

雖然超連結的使用率在 2018 年之後略有下降，但 Facebook 上剩餘的極右行動者，依然持續以超連結為主要策略。在我們的資料中，有 69% 的超連結分享，是來自極右媒體與商業行動者的。極右行動者在平台上的存續並非巧合，而是為了維繫自身的能見度與影響力，刻意地遵守平台規範的策略性成果。

為了符合 Facebook 的邏輯與準則，極右行動者通常避免公開發表仇恨言論，或分享具有極端主義背景的連結。在此過程中，他們會採取某種表演式的節制 (performative moderation)。他們在社群媒體上淡化自身的言詞，專注於隱微的框架、而非明確的行動號召，並在發布的內容中，附上較難監控的外部網站連結。

前述提及的極右另類媒體 RT DE 和 Tichys Einblick 就是採用這種方式，它們在 Facebook 上發布的內容，幾乎都會提供能直接連結到自身的網址。這種策略可以讓他們繞過內容審查、維持能見度，並有可能向更廣泛的受眾展現較溫和的形象，同時持續地推廣排他／非自由議程。

> 「借用的」正當性與主流媒體的角色

平台主流化的另一個重要機制，是「借用」主流媒體的正當性。在我們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發現之一，是極右行動者經常在他們的 Facebook 頁面上提供來自主流媒體，而非另類媒體的連結。此外，行動者分享的連結種類也各自有異。AfD 便主要分享來自國家級優質報紙的文章，例如 Die Welt，而 PEGIDA 則偏好小報和地區性媒體，例如 Bild 和 Nordbayern。

這種從傳統媒體借用正當性的做法，讓極右行動者得以將他們的訊息，包裝成有著具有信譽的來源。這進一步顯示，主流與邊緣之間的界線，可能比許多人所意識到的更加鬆散。極右派勢力不再需要自己製作所有內容，他們選擇性地從主流媒體中蒐集素材，來支持其反移民、反菁英或仇視伊斯蘭教的立場。

> 對民主的影響

正如德國極右派在 Facebook 上的案例所示，平台主流化的概念，很好地呈現出全球極右派如何在網路上活躍並持續演變。我們今天所見的，不只是「主流的激進化」或「激進的主流化」。相反地，這是一個互相強化的過程：為了在主流社群平台上保持活躍，極右行動者調整策略以符合平台規範，而社群平台的運作邏輯則促使極端的內容，被重新包裝成看似溫和的形式。

這樣的現象影響深遠。它挑戰了反策略——例如事實檢查、內容限制和去平台化的有效性。極右派利用了平台主流化，繼續在社群媒體平台所設定的規範內運作——比如借用主流媒體內容、以「更安全」的形式傳播，或將受眾引導至第三方網站。歸根結柢，問題不再是極右派是否應該被允許在主流社群媒體上活動：這些平台已經順利地成為了極右派於線上活動的要素之一。

更迫切的問題是，如果社群平台的規則改變，會怎麼樣呢？事實上，在 2025 年 1 月，Meta 取消了 Facebook 的第三方事實檢查，取而代之的是由使用者生產的「社群筆記」。關於什麼內容——尤其是圍繞移民與性別認同等議題的內容——可以在平台上發布的規範也已經更新，審核系統的任務縮減，變成只聚焦在較為嚴重或違法的情況。這些改變對平台主流化有何意涵？

>>

我們的研究顯示，這些發展可能會進一步增加極右勢力在網路上的活動量，加速主流勢力的激進化，並為自由民主國家帶來更廣泛的挑戰。即便試圖以更嚴格的內容管制來限制極右派行動者，Facebook 仍然促成了極右勢力的平台主流化。這種新的平台運作邏輯，似乎對於極右陣營更為友善，讓極右派行動者更自由地傳播他們的敘事，並進一步使他們在主流政治論述中的存在正常化。

因此，要對付社群媒體上的極右勢力，不能僅僅依賴於事實查核與內容限制制度、國家監控或學術研究。由於極右派行動者將會適應社群媒體運作規範的改變，並繼續推廣論述，這些可能提供能見度的渠道，最終仍可能成為極端主義內容主流化的手段。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採取系統性的方法，將社群媒體平台本身視為行動者，他們是有自身政治議程、以獲利為導向的私人公司，並不是一個中立的環境。■

來信寄至：

Damla Keşkekci <damla.keskekci@sns.it>

> 優化陽剛氣質： 男性自我提升的網絡與意識形態戰場

Pasha Dashtgard，美國華盛頓美利堅大學，極化和極端主義研究與創新實驗室



男孩和男人對自己是誰和他們被期望成為什麼樣的人之間的差距感到痛苦。圖片來源：Elias Schäferle，Pixabay。

> 導言

網絡上專為男孩和男人所設且未受男性至上主義意識形態所影響的空間越來越少了。許多以男性為中心的空間，最初是作為尋求建議、支援和友情（camaraderie）的空間而出現的，卻已然成為了激進化的溫床。無論是在約會和兩性關係論壇、健身和時尚社群，還是遊戲與運動的討論板上，惡毒的性別歧視言論正變得越來越尋常。將反動信念巧妙地嵌入那些表面上無涉政治或聚焦於自我提升的內容中，使人難以察覺極端主義觀點的存在，從而進一步促進其擴散。

在這些以男性為中心的網絡空間中，一條清晰可見的主軸即是對自我優化（self-optimization）的高度關注。在這語境下，自我優化被理解為一種持續進行並專注於持續的自我提升——這通常受到社會期待與個人抱負所驅動——的個體

主義策略。雖說自我提升就其本身而言完全是健康的，然而對自我優化的執著（fixating）卻可能導致對最大化身體與生活方式的迷戀，比如透過自我追蹤、自律訓練、健身、整形手術、神經強化、營養補充品的使用、甚至是在戀愛與人際關係中奉行僵硬、制式化的策略與方法等。自我優化的敘事支撐了許多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產業，這些產業往往依賴於內化的羞恥，自我厭棄以及一種「意志征服物質」（mind-over-matter）的強迫性思維，來推動人們追求一種理想化的陽剛氣質。對這些觀念的內化將導致一種看法，即把未能進行自我優化或自我優化未果者視為次等的，尤其是在當事人眼中更是如此。這種看法對男孩與男人造成了巨大壓力，迫使他們追求一種由完美的體能、卓越的性能力以及出眾的財富成就所構成的不可能的組合，其中任何一項的缺失似乎都證明了未能正確體現男性氣概之無能。

在生活各個層面都要進行自我優化的這種關切，會加深個體對意識形態灌輸的脆弱性。Haenfler（2004）

>>>

特別指出，個體對自我控制與道德純潔的關注如何可能被利用（weaponized）於導致次文化的反抗與群體認同的行程。雖然自我提升是一個有價值且值得讚賞的目標，對自我和群體純潔性的強調——以及透過痛苦和否定愉悅感來進行規訓——會使不懷好意的能動者與有毒的意識形態得以將偏離傳統男性理想的行為描繪為一種道德上的失敗，並將其視為女性主義與進步主義頹廢腐化現代男性的例證。

> 約會與兩性關係：紅藥丸與「男人圈」的崛起

極右意識形態紮根最明顯的領域之一，即是網絡上關於約會與兩性關係的討論。在所謂的「男人圈」（manosphere）——一個充斥男性至上主義意識形態的線上空間網絡——中遍佈的「紅藥丸」（Red Pill）社群，是男孩與男人最容易接觸到的空間之一，其中提供了關於如何操控女性、如何與盡可能多的女性發生性關係以及如何扮演女性們無法抗拒的「強大、性感的 alpha 男」等等的建議。這些論壇、網站、應用程式與平台將女性主義與女性賦權視作對男性的直接威脅。在這些社群中，傳統的性別角色被強化，女性被描繪成善於操弄、追求高嫁（hypergamous）且不可信賴的存在。信奉這些觀念的男性被鼓勵去支配兩性關係並拒絕任何形式進步的性別平權。儘管這些觀念起初只是約會建議，它們卻往往成為通往更廣泛反動政治的入口。

「男人圈」中另一個有毒的子群體是「厭女的非自願單身者」（misogynistic incel）——「incel」意即非自願單身者（involuntary celibate）——社群。厭女的非自願單身者們相信，一種壓迫性的女性主義社會秩序——即女性只會選擇有魅力且具支配力的男性——使他們在戀愛與性方面陷入絕望。許多非自願單身者將個人困境歸咎於女性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及其它他們所認為的社會變遷，這種怨懣情緒可能進一步滋生暴力行為。非自願單身者們採取一種宿命論的、生物決定論的社會觀，這種觀念認為一個人的基因與外貌要麼保證其在性、財富與社交上獲得成功，要麼注定陷入悲慘與失敗的人生。與非自願單身者相關的暴力事件日益增加，包括多起大規模槍擊，顯示了這些有毒意識形態在現實世界中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 時尚與健身：從「拼命變好看」到極端主義

表面上為男孩及男人們在如何更好地穿搭、練就六塊腹肌、改善儀容等技巧上提供建議的網絡空間，正日益被那種利用男性的不安與他們想要在所謂男性階序中向上攀升的渴望的敘事所佔據。

「拼命變好看」（looksmaxxing）是在一些專注於時尚、外貌及健身的線上自我提升社群中所流通的網絡用語，指涉的是如下過程：個體透過偽科學、「另類」療法，以及各種當代男性至上主義的庸俗騙話（quackery），來分析並進行最大化自身外貌吸引力。雖然表面上看這不過是一種無害的自我完善形式，但許多「拼命變好看」社群增強了許多有關陽剛氣質、遺傳學與社會階層的有害觀念。這些討論往往與優生主義信念交織在一起，鼓吹只有特定身體特徵（即白人、盎格魯撒克遜人）是值得嚮往的，並將基因決定論描繪為無法超克的現實。

健身文化也成為了極右派激進化的入口。許多男性至上主義網紅（influencer）利用健身及男人想要增強身體的慾望來倡導主流陽剛理想的觀念。對力量、紀律和支配力的討論，有時被構造成對抗個體道德墮落並進一步擴展成對抗整體社會衰敗的方式，這些敘事加深了意識形態的分裂。在某些線上健身社群中，無法維持精練、強壯的體態，會被視為是一種道德上的失敗，即無法控制自身慾望進而沈溺於自我失控之中。

極右派對健身日益濃厚的興趣已促成所謂的「積極俱樂部」（Active Clubs），將武術訓練與極端主義意識形態進行結合。這類俱樂部通常以自我防衛、自我提升與賦權之名吸引男性加入，實際上往往成為政治暴力的訓練基地。健身與極右派極端主義之間的這種聯繫，凸顯了看似無害的網絡社群如何可能最終導向在現實世界中的激進化。

> 運動與電子遊戲：男性至上主義常態化的新戰場

除了傳統的自我提升空間，男性至上主義意識形態也滲入了電玩和運動相關的論壇，這些論壇可是男人與男孩們在網絡上的主要文化據點，結果是，自我優化敘事也同樣植入到關於運動和電子遊戲的各種論述當中。

電子遊戲天然地促成了一些小眾網絡社群的形成，基本圍繞著特定遊戲或開發公司而建立。「玩家門」（#GamerGate）是一場發生於 2014 年的爭議事件與線上騷擾行動，表面上以探討電玩新聞倫理為核心，實則由遊戲社群內部的厭女情緒和反進步傾向所驅動。這場事件牽涉了對遊戲產業中的女性的有組織的騷擾、肉搜（doxxing）以及威脅，特別針對那些倡導多元與包容的開發者、評論者與記者。「玩家門」事件展現了電玩如何塑造強烈的社群認同感，以及遊戲社群在特定條件下容易受到激進化影響的潛在風險。許多遊戲論壇培養出一種「政治不正確」文化，種族歧視、性別歧視與恐同的笑話屢見不鮮，以「言論自由」的名義強化排他性的世界觀。雖然「玩家門」已不再是當今網絡上的動員主力，其遺緒仍可見於部分玩家群體對具有多元選角、或聚焦於被視為「覺醒」或進步主義的角色故事的遊戲、電影和電視劇所做出的反應。

此外，運動類網紅透過 Youtube 和播客等平台推動反動敘事，針對從事社會運動的運動員進行批評，並將保守派政治評論與媒體報導混合在一起，時常抨擊體壇中的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s），比如爭取種族正義的抗議行動或促進性別包容的倡議。其中一個例子是知名體育媒體品牌 Barstool Sports，在將男性至上主義觀念主流化的過程中扮演了某種角色。儘管它將自身表現為輕鬆搞笑、充滿兄弟文化（bro-culture）的媒體平台，其內容卻經常宣傳厭女情緒、貶低進步運動，並助長一種超陽剛（hyper-masculinity）的文化氛圍。Barstool Sports 長期經營的專欄有「猜猜那屁股」（Guess that Ass）、「猜猜那對胸」（Guess that Rack）以及「扭扭星期三」（Twerk Wednesday）。Barstool Sports 創辦人 Dave Portnoy 在 2010 年寫過這些話：「我從不贊成強姦，但如果妳是六號身材又身穿緊身牛仔褲，那妳有點像是活該被強姦，不是嗎？」透過將這類言論包裝為幽默、

前衛或反叛，將使這些觀念更容易吸引那些只是想關注體育新聞的年輕男性，使他們在不自覺中也接觸並吸納了男性至上主義的意識形態。

> 結論

男人與男孩們的數位空間日益受到男性至上主義意識形態的形塑，將原本是支持性的社群轉化成激進主義的溫床。在自我提升的喬裝中——無論是透過約會建議、健身、時尚、運動還是電子遊戲——這些空間使反動信念常態化，增強了傳統性別階層以及排他性的理念。極右意識形態對這些空間的滲透，凸顯出建立更健康、更具包容性的男人與男孩社群的迫切需求。

要對抗這一趨勢，我們必須問：男孩們和男人們如何建立社群，而不必被迫接觸以男性至上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內容？答案是去開創新的、積極的空間來推廣健康的男性氣質、情緒智力與真誠的相互支持。鼓勵針對認同、脆弱與尊重開放對話，有助於導引年輕男性遠離有害的影響。最終，社會必須投入資源來培養具包容性的環境，使男人和男孩能在其中相互聯絡、共同成長，而不至於被有害的意識形態所吸納。男孩與男人渴望尋找提供建議、指引與歸屬感的社群與網絡空間；但這些以男性為主的空間完全沒有理由必然淪為厭女與極端主義的溫床。■

來信寄至：
Pasha Dashtgard <dashtgard@american.edu>

*譯註：「Alpha male」原指動物群體中具支配地位的雄性，後來被用來形容在人際關係中展現自信、領導力與性吸引力的男性理想形象。與之相對的「Beta male」則指較內向、順從、缺乏主導地位的男性，常被某些網絡社群貶為不成功或不具魅力的失敗者。這個概念在當代常被用來推崇男性優越，也受到批評為強化有害的性別刻板印象。

> 極右派對時尚的武器化

Andrea Grippio，維也納美術學院，奧地利



從统一到碎片化：極右翼的審美漂移。
圖像由作者使用 ChatGPT 建立。

極右派的集體行動經歷了深遠的轉型。除了直接的政治對抗之外，著重於象徵性、美學性與表演性的文化策略已大幅擴展。極右派的行動者如今試圖透過生活風格的實踐來重塑集體想像、重新界定文化歸屬並影響日常生活。

> 極右派時尚的角色變化

時尚已然成為極右派在爭奪文化霸權的戰鬥中最有效的工具，提供了一個能以宣傳並常態化排他敘事、民族主義神話以及威權主義理念的媒介。在極右派文化轉向的核心處，時尚已然被有策略地武器化 (weaponized)。

在納粹光頭黨 (Nazi skin) 次文化中，時尚作為進入該群體的門徑以及建構認同的關鍵工具而發揮著功能。透過「拼裝」(bricolage) 的過程，納粹光頭黨結合了英國工人階級風格、牙買加與摩德風格的影響，塑造出一種獨特的光頭美學：剃光的頭、皮革外套與軍靴。儘管在歷史上曾具有強大影響力，這種光頭美學在今日也僅只是極右派更為廣泛而分散的視覺文化中的一個支流。

自1990年代末以來，極右派時尚趨於多樣化，從過往的明顯 (overt) 的符碼轉而傾向於偽裝 (camouflage) 與曖昧 (ambiguity)。美學上的一致性不再是進入此運動的必要條件；相反地，時尚成為展現差異性和適應力的空間。正如 [Miller-Idriss 所觀察到的](#)，「今日的極右派青年可以表達自身的個性同時仍然是一個右翼分子。」

極右派擁抱「時尚的語言」(language of fashion) ——這不僅是一種表達身分與歸屬的方式，還是藉由符號、風格與日常消費品來獲取能見度、吸引新追隨者並將其世界觀予以正常化的手段。美學策略穿越各個極右派世代而演變著，在視覺語言 (visual language)、風格及象徵的運用上展現出顯著的創新，用以傳達其意識形態與文化價值。這些美學轉變促使一種進入主流空間的柔性入口，潛移默化地推動著社會可接受範圍的邊界。

> X 世代(1965-1980):美學反叛與混合風格

1990年代末，極右派經歷了一場重大的美學轉變，脫離納粹光頭黨次文化那種僵化的一致性，轉而擁抱更為多樣、混合且帶有叛逆性質的美學風格。這個時期出現的關鍵視覺原型是維京戰士：符文、英靈殿 (Valhalla) 意象以及諸如索爾 (Thor) 之類的神話人物成為服飾上反覆出現的主題，既作為力量的標誌，也作為族裔傳承的象徵。這些神話意象開始與極右派傳統符號交融，結合了諸如重機騎士、搖滾族與小流氓 (hooligans) 等來自反文化領域的元素。街頭服飾 (streetwear) 開始成為一個關鍵的參照，形塑出一種平衡了陽剛叛逆與意識形態暗示的視覺認同。符號變得更加隱晦和含糊，容許穿戴者表達其歸屬感的同時避免立刻受到公眾的審視。

轉捩點出現在德 Thor Steinar 的興起，該品牌的風格結合了北歐-日耳曼神話與戶外機能性，其標誌、數字（比如「44」）與符文符號構成了一個符號學上的灰色地帶——可於極右派圈內加以解讀（decipherable），並在公共領域加以否認（deniable）。甚至品牌名稱本身也結合了北歐雷神「索爾」（Thor）與「斯泰納」（Steinar），暗示武裝親衛隊（Waffen-SS）將軍 Felix Stainer。其策略是顯而易見的：將激進的符號嵌入迎合主流（mainstream-friendly）的設計之中。

這一策略成了典範。像 Erik & Sons 和 Ansgar Aryan 等品牌隨之而起，強化了一種強調傳承、力量與反抗的「戰士」精神——這些實則是白人至上主義的符碼，卻包裹在看似中性的美學風格之下。

> 千禧年代(1981-1996):古典時代與文化偽裝

數位文化的興起促使極右派時尚的又一次轉化。侵略與軍事風格的打扮讓位給更洗練也更具有市場吸引力的美學——休閒運動風、日常風（normcore）以及文青風（hipster）。極簡的 Polo 衫與柔和色調取代了戰鬥靴和飛行夾克。

就象徵層面而言，維京主題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對古典時代（classical antiquity）的擁抱：斯巴達、羅馬、方陣（phalanxes）、軍團。極右派重新想像自身為一個受到多元文化主義圍攻的希羅文明繼承者。在這樣的視覺文化中，歐洲被塑造成一個獨立且文化上純粹的文明整體。這一轉變與「族裔多元主義」（ethnopluralism）一致——強調文化分離而非種族層級。諸如 Phalanx Europa、Pivert 以及 Peripetie 等品牌，將希臘與拉丁標語以及英雄式的意象融入到日常風的服飾之中。

堅韌（resilience）與文化起源等主題，透過一種乾淨、親和的美學風格被傳達出來。這一策略使這些品牌能夠同時在激進圈子和主流空間中流通。服裝成了特洛伊木馬：外表顯得中性平和，卻充滿意識形態張力（ideologically charged）。

> Z 世代(1997-2012):美學的過度常態化與視覺操演性

而就 Z 世代方面來看，極右派時尚吸收了反諷、柔和與曖昧的風格。這一代人成長於網絡時代，將迷因文化、大眾審美與反叛性（subversion）融為一體。意識形態訊息被嵌入輕盈的或幽默的設計之中——經常引用如 LGBTQ+ 意象或左派口號等對立象徵，只為了隨後再挪用於嘲諷或意識形態倒裝（inversion）。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德國極右派 YouTuber Tim Kellner，其商品設計以彩虹色、獨角獸與反諷性的標語來嘲弄包容性與性別多樣性。這些商品將明亮、包容性的視覺風格與仇恨內容融合在一起。這種精心設計的視覺錯位（dissonance）——以流行包裝包裹激進內容——已成為 Z 世代極右派的標誌性特徵。

> 結論

從一致性到混合，從神話到古典文明，最終又從符碼暗示到過度常態化的反諷，極右派時尚已演變成一套高度精緻化的文化傳播系統。一開始作為次文化認同的表達，如今已然發展成一個完整運作的生活風格市場，能夠透過日常服飾將極端主義敘事加以常態化。

將極右派美學與主流時尚進行整合不僅是一種品牌操作，而是一項為了達到常態化（normalization）的深思熟慮的政治策略。透過將其意識形態嵌入日常消費文化中，極右派行動者正在移動可接受之言論的邊界。他們對日常風格與極簡風格的運用，使自身看起來顯得無害，從而將自身的觀點塑造成更廣泛並且常態化的政治景觀的一部分。結果是一種微妙而陰險的美學戰爭——極端主義被包裝在柔和、反諷與主流愛好之下，使得抵抗變得更加困難以及滲透變得更加有效。最終，美學是被武器化了，而極端主義則被常態化。■

來信寄至：
Andrea Grippo <a.grippo@akbild.ac.at>

*譯註：Waffen-SS 是納粹德國時期隸屬於黨衛隊的軍事組織，以高度忠誠與意識形態著稱。該部隊在二戰中參與多場戰役，也因涉及大規模戰爭罪行而臭名昭著。

> 極右翼如何 侵蝕了公民社會

Sumrin Kalia，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德國



2022年3月30日，人們聚集在卡拉奇舉行的TLP集會上。
圖片由作者拍攝。

在整個歐洲及其他地區，極右勢力不再是處於邊緣的勢力。近年來，極右翼政黨在選舉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他們運用國家機器在法律面上起訴少數族裔、鎮壓人權組織，並鼓勵私刑暴力對付邊緣社群。

那麼，究竟極右翼政黨為何以及如何獲得大眾的青睞？這些問題成為當今許多學術研究的焦點。[有些學者認為](#)，全球化和現代化所帶來的快速轉變，造成了大眾對經濟和文化上的不滿，因此，這個條件也為極右政黨的崛起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其他學者則認為，主流政黨反應冷淡；此外，以階級為基礎的投票衰退，以及政治媒體化的日增，都促進了極右排外主義思想容易取得與大眾的共鳴。

> 以巴基斯坦為案例

其實，上述條件在某些國家一直存在，例如巴基斯坦。然而，軍方的監護控制和選舉競爭的制度化薄弱，限制了極右政黨在巴基斯坦的崛起。儘管如此，他們的思想仍是相當受大眾歡迎，並導致民眾對巴基斯坦少數族群、女性主義和自由主義團體的敵意大增。

在此篇文章中，我認為要理解極右思想如何取得大眾的共鳴和它的被正常化，我們需要將焦點轉移到公民社會，將其理解為社會和政治參與的領域。極右翼政黨運用運動策略來利用現有的不滿，擴大其思想的影響力，並改變政治行為、態度和文化。

為了敘述我的論點，我研究了巴基斯坦極右政黨的案例。巴基斯坦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案例來研究極右思想在公民社會中的正常化，因為政治體制在執行民主規範方面很薄弱，軍方透過選擇性的贊助和鎮壓政治行動者來控制政治競爭。因此，政治競爭蔓延至民間社會，極右翼政黨不只參與傳統的政治偏好形成，也參與具爭議性的政治動員。

接下來的內容，我會說明極右翼政黨如何使用類似社會運動的策略來增加其排他主義與社會大眾的共鳴。特別是，我說明了政黨領袖、成員和社會運動參與者使用的三種技巧，以擴大他們的想法和行為標準。

> Tehreek-e-Labbaik Pakistan (TLP)

Tehreek-e-Labbaik Pakistan (TLP) 自稱是一個宗教政黨，主張捍衛巴基斯坦的反褻瀆法律，這些法律特別針對冒犯伊斯蘭教、其神聖人物與《古蘭經》的行為。TLP於2018年首次在全國選舉中嶄露頭角，推出262位候選人，成為全國第五大政黨。到了2024年選舉時，他們的得票數已升至全國第四，超越了所有傳統的老牌伊斯蘭政黨。除了參與選舉，TLP也強烈反對任何針對褻瀆法進行改革的討論，並為針對阿赫邁底亞教派信徒、女性主義者與社會運動者的暴力攻擊與法外殺害行為辯護。

巴基斯坦是一個能夠說明極右思潮如何在公民社會中被「正常化」的有力案例。這是因為當地的政治競

爭並不完全透過選舉制度進行，而是在公民社會中展開角力。由於軍方長期掌握實權，對司法、立法與行政體系形成強大制約，也大幅限制了公民自由，使得民主制度的運作始終薄弱。此外，嚴重的社會不平等與菁英階層的壟斷，進一步壓縮了社會的流動空間。左派、世俗團體與女權運動的發展也受到打壓，難以茁壯。[在歷史上，軍方為了維持自身控制地位](#)，經常對各種政治勢力採取選擇性的保護政策，包括伊斯蘭主義者。過去的軍事政權偏向支持迪奧班德學派（Deobandi）與薩拉菲運動（Salafi）之團體，而現今的政權則助長了TLP的崛起，不僅提供其更多政治空間，也提升了其政治正當性。

> 侵蝕公民社會的技巧

與歐洲大多數極右政黨一樣，TLP結合了選舉與社運策略，使其能同時參與公民社會與正式的政治競爭。極右翼政黨在轉型為正式的政治實體之前，通常會先在公民社會中發起社會運動，再將自己組織為運動或公眾政黨。[作為混合體](#)，他們結合了選舉和社運策略，政治企業家和社運份子也同時投入具爭議性的政治動員和傳統政治偏好的形成。

作為一個運動型政黨，TLP運用了我在下文中詳細介紹的三種技巧來擴大其影響力，並在公民社會中獲得合法性。我將這三種手法合稱為「侵蝕公民社會之手法」，以擴大其政黨理念與行為準則的影響力。我所說的侵蝕，是指一個文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公民社會與非公民社會之間的界限被突破，以致於非公民社會侵蝕了公民社會。

> 敘事的重構

TLP重塑其宗教敘述以實現其政治目標。例如，先知造訪塔伊夫（Taif）的故事——這段歷史過去常被視為展現忍耐與寬恕的典範——然而，卻被 TLP 魅力十足的領袖 Khadim Hussain Rizvi 改寫為一則鼓勵仇恨與復仇的敘事。同樣地，Ilam Din 的故事——一位年輕穆斯林在殖民地時期的印度刺殺一名印度教出版商——也被 TLP 的行動者重新詮釋為讚頌法外暴力的象徵。這些重新演繹透過富有煽動力的演說、經過剪輯的社群媒體影片，以及將宗教虔誠與政治行動混為一談的修辭手法進行強化。

> 運用捐客遊走於不同網絡

TLP 透過吸收草根社運者來擴大其影響力，這些行動者在不同網絡之間扮演捐客角色，使 TLP 得以滲透既有的宗教組織與網絡。例如，在 2018 年選舉期間，TLP 的行動者與 Dawat-e-Islami (DI) 及 Sunni Tehreek 等組織建立聯繫，並利用 WhatsApp 群組傳播 TLP 的宣傳訊息。同樣地，他們也在 Anjuman-e-Tulba-e-Islam (ATI) 等學生組織中散布政治言論，為 TLP 的 Faizabad 靜坐行動爭取支持。這些捐客促進了該黨影響力向其核心教派基礎之外擴展，進一步延伸至不同的宗教、教育與政治領域。

> 符號表演

TLP將其排外思想嵌入既有的宗教符號與實踐之中，以增強情感共鳴。清真寺——尤其是位於卡拉奇的Bahar-e-Shariat 清真寺——成為將例行宗教集會轉化為政治動員場域的重要空間。原本用以頌讚先知的儀式，也被重新利用來傳播TLP的政治敘事。在選舉活動中，具象徵意義的先知履屐（Nalaa'in）被當作競選標誌，而原本表示虔敬的親吻拇指行為，則被重新詮釋為支持TLP、投票給TLP的象徵行動。

TLP的擴張並非憑空發生。在巴基斯坦，早已存在的社會文化分化、軍方支持、以及反對社會運動等弱勢的條件，皆助長了該黨的滲透與崛起。TLP善用歷史上的伊斯蘭運動，特別是1950與1970年代的反阿赫邁底亞（Ahmadi）運動，重新敘述並以「維護先知的神聖性」為核心訴求，塑造自身為宗教正統的代表，藉此取得政治與宗教上的合法性。它也受益於巴基斯坦的混合政體結構——軍方對宗教政黨採取選擇性的容忍與支持，卻同時壓制其他政黨。這樣的局勢，使得TLP的影響力得以突破其傳統的巴雷爾維（Barelvi）教派支持者，進一步擴張。與此同時，其他公民社會行動者，例如宗教少數群體、左派政黨與女性主義者，則持續受到打壓與政治贊助制度的限制，難以有效回應TLP持續擴大的影響力。

在缺乏健全公民自由、宗教民族主義盛行，以及政治庇護主義深植的情況下，巴基斯坦提供了極右勢力滲透與侵蝕公民社會的肥沃土壤。然而值得反思的是，在那些政治體制強健、公民權利受到保障、政治競爭制度化的社會中，極右勢力是否仍有可能侵蝕公民社會？若是如此，它們又是透過什麼方式實現的？最終，唯有健全的政治制度與強大的公民社會，共同構築防線，才能有效抵抗極右思潮對公民生活的侵蝕，以及其在全球政治體制中正常化之趨勢。■

來信寄至：Sumrin Kalia <sumrin.kalia@fu-berlin.de>

> 民粹主義治理 對公民社會倡議的影響

Roberto Scaramuzzino 和 Cecilia Santilli，Lund University，瑞典



在遊說和宣傳之間。
圖像由作者使用 Microsoft Copilot 建立。

右 翼民粹主義政黨在自由民主國家崛起，引發了關於民主現況與未來的激烈討論。瑞典是明顯的例子：該國擁有穩定的民主制度、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以及對公共機構高度的信任，但右翼民粹政黨「瑞典民主黨」卻在一屆又一屆選舉中屢戰屢勝。2022年選舉後，瑞典民主黨透過支持由自由保守黨領導的中右翼政府，直接介入國家政策制定。

>>

本研究團隊憑藉於隆德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在公民社會研究領域的豐富經驗，並獲得瑞典研究委員會的資助，於2024年啟動了一項名為「公民社會與民粹主義：民粹政黨崛起如何影響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的研究計畫。該計畫採取比較研究的方法，聚焦於兩個國家：瑞典與義大利。後者是個有著悠久右翼民粹政黨影響政府政策歷史的自由民主典範。在這篇簡短的文章中，我們介紹該計畫的研究議程，並分享近期發表於《政治、文化與社會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的一則案例研究心得。

> 倡議在自由民主國家的核心地位

公民社會組織（CSOs）在自由民主制度中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倡議。對某些組織而言，這意味著為其成員的權利或利益發聲，如婦女、身心障礙者或其他少數群體的權益；而另一些組織則追求較為普遍的利益，且不具嚴格的代表性角色，例如專注於永續發展、和平或人權議題。這種倡議角色是自由民主的重要特徵，前提是必須能夠參與自由的公共討論與政策制定過程。因此，公民社會組織可被視為國家機器與公民之間的中介者。

這種倡議角色可能與許多右翼民粹政黨對其在社會及政治體系中定位的理解產生緊張甚至衝突。這些政黨傾向強調領導者與人民之間的直接連結，拒絕像公民社會組織這類中介者，視其為腐敗菁英的一部分。此外，過去數十年中，許多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處於核心地位的公民社會組織，起源於推動人道主義、團結、少數群體權利及反歧視的社會運動。這些價值觀與許多右翼民粹政黨所持的民族主義、本土主義及價值保守立場形成衝突。

> 倡議與公民社會組織的四種回應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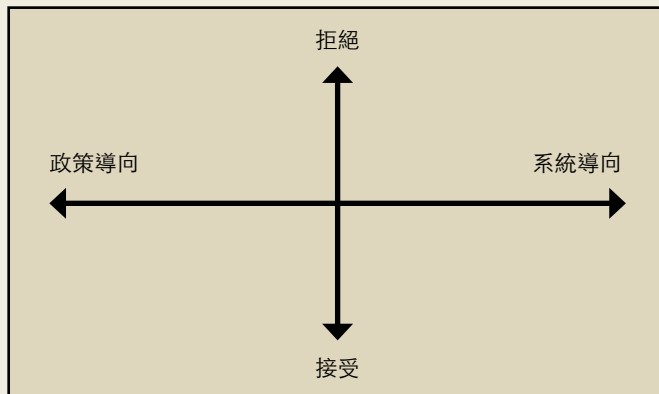
我們的研究探討義大利與瑞典在2024年中，具有實際運作效能的公民社會組織如何回應政府的預算立法。預算立法是治理中的關鍵環節，負責為各項政策分配資源，包括對公民社會組織的資助。它也可能成為民粹治理的重要工具，民粹治理即指民粹政黨行使權力的方式。我們研究具實際運作效能的公民社會組織，是因為它們在政策制定中居於核心地位，且擁有相當的資源，故其行動能力若因資金削減而受限，將深受民粹治理措施所帶來的變化影響。同時，這些組織也因其運作效能，能夠對政府的規定提出批評，儘管這可能冒著失去其特權地位的風險。

為了理解不同的倡議策略，我們建立了一個公民社會組織對政策變動回應的模型，基於兩個維度：1）批評的程度，從接受到拒絕；2）批評的範圍，從針對政策到針對制度。這兩個維度相互交叉，形成四種不同的回應選項，如右方的模型所示。

該模型根據這些維度對回應進行分類。政策導向的接受（左下角）適用於大致接受政治現狀，但可能批評具體政策細節的公民社會組織；系統導向的接受（右下角）則適用於接受較廣泛政治架構，但主張重大體制改革的公民社會組織。

關於較具衝突性的回應，政策導向的拒絕（左上角）適用於反對民粹政府特定政策或倡議，但不挑戰整個體制的公民社會組織；最後，體制導向的拒絕（右上角）則適用於根本反對民粹治理並主張全面轉型變革的公民社會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對政策變動的回應



資料來源：作者。

> 不同的公民社會組織會有不同的回應方式

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四種回應類型皆有實例，顯示公民社會組織對民粹治理所帶來的變化反應可能截然不同，這取決於它們在組織領域中的定位。某些政策領域可能較多或較少面臨被公民社會組織視為不利的改革，影響成員對該組織影響力或所代表利益的認知。與活躍於特定政策領域的公民社會組織相比，有些致力於代表整個公民社會部門的組織，可能會採取較具衝突性或較謹慎的態度，這或許取決於其成員之間的共識程度。根據其意識形態與使命，有些組織也可能對其所感知的民族主義一保守議程感到更大的威脅，例如與工人或移民運動相關的組織便是如此。

這些結果顯示，不同的公民社會組織會根據對改革影響的認知、其關注的政策領域、意識形態與價值基礎，以及其在公民社會部門階層中的位置，對民粹治理做出不同的回應。

> 情境因素對公民社會組織的回應具有影響

比較研究的一個核心價值，基於情境對我們關注結果具有重要影響的假設。義大利與瑞典作為歐洲穩定自由民主國家框架下，提供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情境。義大利的公民社會傳統上主要以提供服務為導向，而瑞典的公民社會則偏重於表達性功能與倡議。義大利對公民社會的國家資助通常較為間接，透過區域及地方政府，而瑞典則較為直接，由國家機構管理。此外，兩國的民粹政黨類型、歷史發展軌跡及取得權力的途徑也存在差異。

儘管我們發現義大利與瑞典公民社會組織對預算立法的回應存在顯著差異，但同時也觀察到在各自國家內，公民社會組織的回應呈現出相當大的多樣性。在兩國中，我們都看到與四種回應類型中三種相關的回應實例。然而，當檢視並比較兩國的公民社會組織回應時，

我們發現瑞典的公民社會組織較傾向於拒絕民粹治理，並提出更具體系性的批判。鑒於我們的案例研究基於較少數的公民社會組織（每國各11個），這些結果仍顯示國家情境確實對公民社會組織如何回應民粹治理有重要影響。

造成這些差異的一個可能解釋，是義大利作為一個公民社會組織較早面對這些政策的國家，民粹治理的常態化機制已逐漸發酵，而這種常態化尚未對瑞典的公民社會組織產生明顯影響。義大利公民社會部門較偏向提供服務的導向，也可能使公民社會組織較不傾向於批評政府，相較於瑞典那種較重視倡議功能的部門。進一步檢視公共機構，我們也可考慮在一個國家中，如瑞典，國家直接控制公民社會資金，針對阻撓反對派公民社會組織的民粹治理措施，會對這些組織產生更直接的影響，合理地引發更強烈的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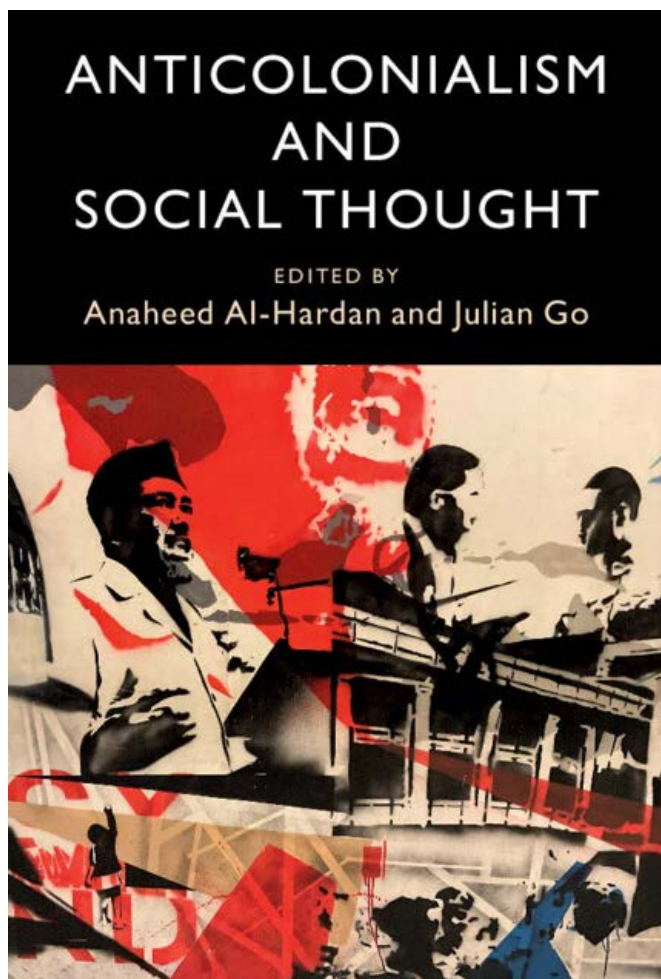
> 公民社會組織能否成為民粹治理的制衡力量？

然而，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容易。必須注意的是，即使是在運作良好的自由民主國家，非民粹政黨執政的政府也曾對公民社會組織實施限制措施。因此，在不同情境下，許多公民社會組織感受到公民空間縮減，這並不令人意外。這種日益有限的行動空間，伴隨著針對許多運作有效的公民社會組織所關注群體與議題的限制政策。公民社會組織能在保持有效運作的同時，對公共政策持批判立場的程度，一直是公民社會研究中的核心議題。這個問題在民粹治理時代尤為重要，因為民粹治理可能導致民主倒退及向更威權統治的轉變。此外，由於民粹治理與右翼話語的常態化，公民社會組織可能更不願意追求批判性的倡議功能。因此，未來仍需進一步研究民粹治理時代下，以及其他國家情境中，公民社會組織活動的結構性與組織性的預設。■

來信寄至：
Roberto Scaramuzzino
<roberto.scaramuzzino@soch.lu.se>

> 歷史與社會理論中的反殖民主義

Anaheed Al-Hardan, Howard University, 美國, 以及 Julian 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美國



《反殖民主義與社會思想》。
由 Anaheed Al-Hardan 和 Julian Go 編輯，劍橋大學出版社。
預計網路出版日期：2025 年 8 月。

過去數十年，人們花費了許多心力嘗試將社會理論「全球化」、推翻主流社會學觀點的限制，並重新思考理論經典。我們認為，應該要讓反殖民主義重回討論焦點，並將其視作前述行動的核心。作為反帝國主義的觀點，反殖民主義陸續產出了許多創新且重要的社會思想。於二十世紀改變帝國世界的抗爭中，反殖民主義者對帝國世界提出了毀滅性的批判——他們挑戰了帝國的種族主義、經濟剝削、政治排除和社會不平等，並試圖更好地理解他們所對抗的世界、發展新的概念與理論方法。在此脈絡下，反殖民主義促成了新穎的社會分析、概念，以及與理解社會相關的理論：一種真正具批判性與多元觀點的社會學想像。因此，借鑑於反殖民運動及其思想家，將是主流社會學觀點破除自身侷限的關鍵策略之一。

> 定位反殖民思想

現代歐美帝國主義，是從十五世紀征服美洲時開始，並在二十世紀最為活躍，其以殖民主義作為政治和經濟統治的主要工具之一。二十世紀時，世界上絕大多數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是殖民帝國或前殖民地。時至今日，帝國主義仍繼續以殖民主義或新殖民主義形式構建世界。然而，來自農民、抵債勞動者（bonded laborers）、被奴役者，或是反對歐洲、美國統治與其帶來的不平等的社運人士、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等等的反抗也持續存在。從 Standing Rock 到 Gaza 的反殖民主義，如今也仍然抵抗著帝國列強的侵擾。從美洲原住民反抗殖民者統治、海地反法革命、二次世界大戰後非殖民化時代反抗歐洲帝國的武裝抗爭，到最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為巴勒斯坦佔領大學校園……等等活動，反殖民主義抗爭以極為多樣、譜系複雜，且具多元傳統的形式，持續形塑並挑戰著世界。

歷史學家呈現出反殖民運動的幾個關鍵面向，並說明其複雜性、矛盾與困境；我們的目標，則是要重新討論反殖民主義的理論與知識層面。正如我們共同編輯、即將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籍《Anticolonialism and Social Thought》所述：反殖民主義在挑戰帝國與帝國主義的過程中，已經／將繼續生產新穎、創新且關鍵的社會思想。從過去到現在，反殖民主義領域一直極為活躍，其提供了獨特的社會思想與社會理論流派，許多至今仍然極受人們重視。因此，我們應該將那些由反殖民主義衍生出的思想，作為社會理論的主要來源。我們將反殖民主義定義為一種政治立場，它承載著某些文化、社會與經濟承諾，並且以扭轉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所產生的不平等現象為宗旨。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這樣的立場皆涵蓋了一系列的批判觀點與計畫。在這份研究中，我們會重新檢視這個立場的社會與社會學層面。

> 挑戰帝國主義的立場

我們的貢獻有兩個主要前提。第一個前提是，在社會學系和社會科學界廣泛流傳的社會理論，大多起源於悠久的帝國主義傳統，並隱晦或明確地涵括了「帝國主義立場」。現今所謂的社會學，以及其抽象原則的表達方式——「社會理論」，皆是在上述歐美帝國主義全球擴張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社會理論在帝國中誕生／源自帝國／為帝國而生，其處理特定種類的問題、制定出獨特的概念與理論，並在研究中反映出帝國都會菁英的利益、關注與經驗。其中，反帝國主義的聲音確實存在，例如 W.E.B. Du Bois，但他們卻受到了排擠。

我們可以由分析類別、基本假設與研究問題中發現，今日的社會科學，仍然帶有早期帝國主義的印記，它們仍舊反映著帝國都會的利益與關注。由帝國主義立場出發而構成的傳統社會理論，受到自身狹隘且華約的觀點所限制。正如近年來許多學者指出，許多學科的社會科學，從理論到研究方法，都無法認真看待自身與帝國主義及種族主義的關係、持續的歐洲中心主義及東方主義，也難以承認自身忽視了世界上多數人口的經驗、利益與關注。與此同時，社會理論與社會學受限於帝國視角，陷入本質主義、分析的分歧，以及以大都會為中心的預設等困境。從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到 Foucault 等被視為「批判」的主流理論家，其理論皆面臨這樣的問題。即使在所謂的「後殖民」世界，許多社會理論與現代社會科學，仍帶有歐美帝國主義的遺緒——尤其因為在許多國家，社會科學最初就是在歐洲帝國與後來的美國帝國文化中形成的。

第二個前提是，要克服社會理論與帝國、帝國主義的基礎關係所遺留下的惡果，我們必須超越學科內現有的嘗試，讓社會學及其理論不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對世界經驗的多樣性更加開放。那些以「本土社會學」、「南方理論」或「南方知識」為主軸的計畫，對此達成此前提來說便極為重要。此外，許多其他的計畫，也同樣試圖尋求社會科學的「自主傳統」，或試圖重新強調歐洲以外的獨特區域與國家傳統。這些認識論的計畫都很有價值，並且以重要的方式推進了對話。同時，它們都有各自的焦點與限制。我們認為，透過把反殖民主義視為作為社會思想的來源，將能夠克服這些限制。

> 全球資本主義政治地理並非反殖民主義理論或政治承諾的必要條件

現有方法的主要限制在於，它們是以一個狹隘的問題——即歐洲中心主義——為對象，並以地理為基礎來設計其應對方式。根據現有方法，主流社會理論的問題在於它源自歐洲或「西方」，因此，補救之道便是尋找「非西方」或「非歐洲」的思想或思想家。其目標是找到並使用「非西方」、「本土」、「亞洲」、「非洲」或「南方」的思想家，以及尋找「西方」和「全球北方」的「外部」的知識空間。亦即，這些方法挑戰的是思想的地理發源，而非其內容，並預設了後者是由前者所決定的。在這樣的預設下，只要某位社會思想家居住於「非西方」或「非歐洲」地區，他們的思想就會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而受到重視。

這類根植於地理學的、針對歐洲社會科學的批判，當然有其道理。從歷史來看，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大致上確實能夠於全球地理上呈現出來，其中，資本主義的核心，即歐洲與後來的美國，經常被理解為「西方」，以及最近我們所說的「全球北方」，其在物質與知識上主宰著「東方」或「全球南方」。然而，這種粗略的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地理，並未能完全解釋帝國主義中心裡面，被殖民與種族化的現實。原住民社區和其他被殖民、奴役者的後代，不只住在全球北方，也住在全球南方。此外，歐洲殖民者及其後裔，也會居住在過去曾被殖民、或正被殖民的地區。

由此延伸出來的另一項限制是，我們很難直接將地理位置，反映到政治承諾或知識形式上。並非所有社會思想家，或是所有源自前殖民世界的理論，就都是反殖民的。前殖民世界的社會論述，仍然可以內化帝國主義的觀點，這不僅是因為帝國主義的歷史散播並制度化了帝國主義的假設，也是因為當代知識生產的地緣政治環境——其服務於當代帝國主義的利益，並複製了新殖民主義的全球知識生產結構。同理，並非所有「歐洲」或「全球北方」的理論家，都必然是霸權帝國主義認識論的一部分。其中一些人過去不支持，現在也不支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且不是從帝國主義的立場出發。反帝國主義運動，尤其是那些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的運動，已經在大城市中擴散。在書中，透過與殖民地夥伴的對話，我們呈現了來自不同傳統的概念，如何延續反殖民政治路線，達成了卓越的傳播和重新論述。

綜上所述，這些以地理為基礎的方法，無法作為帝國主義立場的替代方案，也很難真的批判帝國主義立場。在這些方法之下，人們不知不覺地複製了帝國主義的預設。他們將地區、文化、民族或社會，本質化為不同的類別，同時預設了這些不同地理空間的特定知識屬性。這種「地理認識論的本質主義」，僅是反映出長期以來帝國主義認識論當中的那種本質主義，很久之前，Edward Said 就警告過我們這種本質主義的風險，尤其是在《Orientalism》這本書裡面。

> 反殖民主義立場的承諾

我們並沒有打算拋棄特定思想家或理論的論述及語言傳統，也沒有要宣稱思想發展和制度脈絡是完全無關的。然而，我們認為，光憑地理和身份本身，是不足以界定和分類那些持不同觀點的社會理論家和社會理論的。因此，這本書將會把理解社會思想家和理論家的基礎，建立在反殖民主義，而不是地理身份或位置之上。為了提供一個真正能夠替代帝國主義立場解方，我們將以反殖民主義立場——我們將其定義為反對帝國主義，並反對作為其主要形式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一種社會政治立場——為核心焦點。這樣的立場所促成的，是一個多樣化的社會思想與理論傳統，並且以「反殖民主義」為其標誌。

與某些知識論研究試圖重新以「本土」、「非西方」或其他形式的思想為中心不同，這種以反殖民立場為基礎的思想體系並非、也不可能「外在於」或「脫離」所謂的西方思想。相反地，反殖民思想家在對抗歐美帝國主義時，批判性地使用了歐洲的思想傳統。這些反殖民思想和理論，正是在批判地審視帝國主義立場的思想和論述的過程中所形成。反殖民思想家試圖擴展或修正馬克思主義思想、都市社會學或歐洲哲學的脈絡，就是這種批判性使用的典型案例。此外，反殖民思想過去和現在，都不是侷限於「全球南方」這樣的單一地理空間的，其廣泛傳播於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甚至整個殖民世界之間。毛澤東的思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源自於中國的反殖民主義和革命解放戰爭，並被非洲和亞洲各地的反殖民思想家和行動者接受、重新詮釋。我並不是要否定具中心的結構性權力關係，而是希望人們能夠肯認反殖民主義社會理論家們，如何建構了在邊緣

地區傳播的理論和思考方式，並強調相較於全球權力體系的中心來說，這些關係並不總是水平的，也可能是垂直的。

> 我們迫切需要反殖民主義

我們不會浪漫化、或是不加批判地推崇反殖民立場。反殖民的任務，亦即重塑殖民世界的秩序，本來就不是如此單純。某些反殖民思想，也確實未能完全避免本質主義的身份宣稱，或者是階層制度、基本教義派等傾向的影響。我們關注反殖民思想，並非因為我們假設它在意識形態或政治上毫無瑕疵，而是因為它蘊含著的理論和政治潛力。它提供了豐富的理解、想像、概念與範疇，並提出了一些關鍵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帝國主義立場，以及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傳統社會科學中，所難以表達，甚至遭受壓迫與忽視的。

最後要提醒的是，我們並非要暗示帝國主義與反殖民主義的時代已經終結。帝國主義仍然以持續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形式，一直延續至今。一些地區仍然是正式的殖民地，例如波多黎各、馬提尼克島和安圭拉島。聯合國認為，目前仍有16個地區處於殖民統治的狀態，總人口約200萬。另一個例子，是正在巴勒斯坦發生的，一場以擺脫猶太復國殖民主義為目標的民族解放抗爭。與過去相同，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以各種形式延續，並且遭遇了新型態的反殖民抵抗。不管是在大都市的中心，還是在這個新殖民主義的世界中皆是如此。現今的情境下，我們更加需要強而有力的理論工具和批判視角——我們認為，唯一的解方，便是反殖民主義的社會思想和理論。■

來信寄至：Julian Go <jgo34@uchicago.edu>

> Darcy Ribeiro 與來自南方的全球理論

Adelia Miglievich-Ribeiro, Federal University of Espirito Santo, 巴西



1985 年，Darcy Ribeiro 和 Oscar Niemeyer 訪問巴西利亞大學。
圖片來源：中央檔案館/UnB

巴西社會科學家與公共知識分子 Darcy Ribeiro (1922–1997) 留下了近千頁的著作。儘管他在拉丁美洲作家中成就斐然，其著作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共出版了 90 個版本，但在巴西學術界，針對他研究的關注仍相對不足。與他相關的學術論文數量稀少，這一現象可能源於幾個因素：包括學界對其意識形態立場的分歧、對他堅持「參與性知識分子」(engaged intellectual) 角色的反感，以及在理論被視為過時的時代背景下，他對一般理論的堅持。

1964 年，巴西發生軍事政變，當時的總統 João Goulart 被推翻，而 Ribeiro 作為執政政府的一員，也與總統同樣被迫流亡海外。在流亡期間，他自我認同為一名「拉丁美洲公民」，Ribeiro 活躍於整個地區的知識與政治活動之中。並 1979 年大赦後返國，他加入巴

>>

西工黨（PDT），投入於民主重建的工作，延續其一貫的政治與學術實踐。

> 一個長期的視角：觀察文明發展的歷程

為了理解拉丁美洲長期以來的專制傾向與持續的發展滯後，Darcy Ribeiro 試圖提出一種宏觀的歷史視角。他認為，這些結構性的問題導致拉丁美洲人民淪為「外部無產階級」（external proletariat）。然而，為了掌握這一的歷史特殊性，他首先試圖將拉丁美洲置於全球文明演進的脈絡中，追溯自約 14,000 年前以來的發展歷程。

他提出一系列問題，以探索文明分類與歷史定位的可能性：我們該如何分類那些從先進文明發展而來，或是作為回應殖民征服而改變的前農業部落？如何定位原住民與歐洲征服者之間的關係？又如何理解那些從不同社會發展階段中被迫遷移、並在美洲成為奴隸勞動力的非洲人所扮演的角色？在歐洲征服者中，最早抵達的伊比利亞人與後來接掌廣大區域的北歐移民，他們是否代表了相同類型的社會文化體系？最後，我們又該如何根據各地民族社會融入農商文明乃至現代工業文明生活方式的程度，對他們進行分類並建構出彼此間的歷史關聯？

Ribeiro 年輕時深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影響，特別是馬克思對古近東水利文明的分析。在這種生產模式下，土地由法老所有，並透過官僚體系加以管理，由此統籌農業規劃與勞動力分配。Ribeiro 挑釁性地將伊比利亞與拉丁美洲納入這個全球文明的分析框架中，並回應批評者的質疑：[「儘管如此，我仍保有相信自己是馬克思繼承者的權利。」](#)

他主張，科學論述應透過對社會背景與觀察者立場的敏銳關注加以重構。與馬克思一樣，Ribeiro 強調觀察、比較與詮釋作為通往社會體制轉型路徑的必要性。他寫道：「我們正是以這樣的姿態撰寫《[文明的歷程](#)》……」

早期著作中，Ribeiro 對科技發展進行批判性的歷史探討，識別出自十四世紀以來的十二種文明進程與十八種社會文化之配置。他意識到過度概括的風險，但仍堅持理論建構的整體性，嘗試整合同步與非同步的歷史動態。他的目標是建構一套有力的比較分析框架，避免將不同社會階層化，而傾向以關係性的方式進行解釋。

> 奇異的文明發展歷程與科技創新

Ribeiro 採取的是一種多線性的新進化論立場，與傳統的單一線性進化論（如單一因果或目的論模型）成為區別。他主張一種「不一定要成為進化論者」的歷史觀，強調進化不應被視為線性、單向的發展，而是一種理解社會變遷（包括工業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所不可或缺視角。對他而言，進化指的是一個群體在特定環境條件與歷史事件所設定的限制中，如何以創造性的方式建構其生存方式。這種建構可能會結晶為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但本質上仍是暫時性的與歷史性的。

Ribeiro 的分析跨越多重抽象層次。他運用「文明歷程」這一概念（與 Alfred Weber 的用法相近），同時也關注特定文明的單一發展路徑（類似 Sorokin 所稱的「文化超級系統」）。他認為，科技革命的影響範圍雖然重要，但比起 Gordon Childe 或 Leslie White 所提出的廣義「文化革命」而言，仍然較為有限。他將自己所謂的「文化歷史配置」（cultural-historical configurations）視為對應於 Julian Steward 在文化生態學研究中所提出的「文化類型」，藉此連結社會結構、技術條件與歷史脈絡之間的互動關係。

對 Ribeiro 而言，技術革命代表著人類與自然互動方式的根本轉變，也意味著社會形態的質變。這些革命透過能源使用方式的變化來塑造文明的發展路徑；而能源使用的轉變既受到人類條件的制約，也同時受到人類行動的塑造。不同的進化階段並非以線性方式依序發生，而是透過群體對環境複雜條件的成功適應而浮現。除此之外，技術創新也從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嵌入於一個三元系統（tripartite system）之中的，而每個系統皆具有其內在結構：（一）適應系統：關涉人類生產與再生產其物質生活條件的方式；（二）聯想系統：指規範社會關係與生產關係的制度與組織；（三）意識形態系統：涵蓋所有形式的象徵性溝通，包括語言、知識、信仰、價值觀、社會規範、生活方式與行為。

> 對於現代化與演化速度的反思

Ribeiro 強調，科技發明可以是內部創新，也可能是外來擴散後被採納。每一種文明都有其獨特的吸收與應用模式。基於此，他提出兩個關鍵概念：「反思性現代化／歷史納入」（reflexive modernization / historical incorporation）與「演化速度」（evolutionary acceleration）。

「反思性現代化／歷史納入」指的是一個民族在被迫接觸到技術上更進化的社會文化體系時，喪失自主性，甚至導致自身作為民族實體的毀滅。這種「納入」過程常常以「進步」的名義呈現，實則掩蓋了退步、從屬與去主體化的歷史動力。與此相對，「演化速度」則代表一種另類的可能性，即在與外來文明接觸的同時，透過主體性行動快速調整與創新，以主動、創造性的方式推動自身社會的轉變。

對 Ribeiro 而言，「反思性現代化／歷史納入」並不是真正的發展，而是一種停滯的狀態。唯有當人民有能力自主定義自身的歷史方向與發展目標時，才稱得上是真正的社會發展。

在批判性知識分子的視角中，貧窮、飢餓、種族滅絕與物種滅絕從未被視為「進步」的象徵。歷史並不總是線性地朝向繁榮發展；「之後發生的事」未必就意味著更好的結果。當一種技術被「超效率地利用」所帶來的，反而是大規模破壞，這正說明了進步神話的破綻。系統的崩潰並未帶來任何在氣候條件下的實質適應能力；相反，它們往往被自然條件壓垮，陷入停滯、退化，甚至最終走向消亡。

在當前全球面臨生態退化與社會斷裂的時代背景下，這些批判理論的觀點顯得尤為重要。科技發展雖可能提升效率，卻往往加劇社會不平等，並對弱勢群體造成外部性傷害。以歐洲的繁榮為例，其基礎實際上建構在殖民暴力與資源掠奪之上；而在全球南方，許多地區仍深陷於日益惡化的貧困、戰爭、災難與長期衝突之中。

> Darcy Ribeiro 與當代全球社會學

今日重讀 Darcy Ribeiro 的著作，有助於深化當代全球社會學對「中心／邊陲」的動態理解。他並不將中心與邊陲視為靜態、固定的地理或結構位置，而是作為歷史過程中的兩種運動邏輯：中心代表「進化加速」的軌道，邊陲則是「反思性現代化」的結果——一種被動納入更強勢系統的歷史軌跡。

這樣的視角也邀請我們將 Ribeiro 的構想與當代理論家進行對話。例如，[Niklas Luhmann](#)在承襲[Maturana](#)和[Varela](#)的自組織理論基礎上，將演化系統與其環境之間的互動加以系統化，這與 Ribeiro 對文明發展作為一種動態適應與溝過程的理解，呈現出某些呼應之處。這也引發了重要疑問——文明，是否可以被理解為社會、個體與自然環境之間成功溝通的制度化表現呢？

Ribeiro 的思想亦與拉丁美洲屬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者如 Ruy Mauro Marini、Vânia Bambirra、Theotônio dos Santos，以及世界體系理論的代表人物 Immanuel Wallerstein 形成共鳴。他們共同關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中心與邊陲的權力結構，以及來自邊陲的「反系統運動」如何挑戰世界秩序的結構性不平等。

全球社會學的發展中，實現對稱性的知識對話已

成當務之急。正如[S.F. Alatas](#)所指出，來自全球南方的理論不應陷入「天真的本土主義」（naive nativism），而應致力於培養一種叛逆的、世界性的社會學視野。Sujata Patel 主編的《[多元社會學傳統手冊](#)》（ISA Handbook of Divers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便是這一多元論取向的典範，促進了橫跨國界與地區的知識傳統之間的對話與交流。

展望未來，將英語系的後殖民研究與拉丁美洲的非殖民思想、黑人研究、女性主義分支（subaltern feminism）以及美洲原住民族的認識論互相連結，將是極具潛力的路徑。這些「新認知的主體」（new epistemic subjects）長期在地緣政治與社會結構中處於邊緣位置，但他們對於國家、民族、資本主義、發展與民主等現代性核心概念，提供了極具批判力與創造性的重新思考。

在這個多極、多元的知識世界中，Darcy Ribeiro 的思想構成了一座南北對話、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橋樑。他不僅是一位跨越邊界的公共知識份子，也是一位社會科學家、原住民人類學家、政治實踐者，更是一位風格獨具的文學創作者。他的著作邀請我們思考：知識應如何從邊陲出發、介入世界，並重新定義我們所理解的文明、進步與社會變遷。■

來信寄至：
Adelia Miglievich-Ribeiro <miglievich@gmail.com>

*本文改編自作者的著作[Darcy Ribeiro](#)，《文明與民族：拉丁美洲的社會理論》，Routledge，2024 年。

> 德國反猶太主義的工具化與對巴勒斯坦團結行動的多重壓制

註：本文作者選擇匿名，以避免來自其任職機構、德國媒體、政界人士以及更廣泛國家機器的潛在報復。



出處：Freepik。

2025 年 2 月 19 日，聯合國「被佔領巴勒斯坦領土」特別報告員 Francesca P. Albanese 應柏林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教授與學生之邀，發表題為〈蓄意毀滅的生活條件：對加薩正在發生的種族滅絕的法律與鑑識觀點〉（Calculated to Destroy: Conditions of Life Calculated to Destroy – Legal and Forensic Perspectives on the Ongoing Gaza Genocide）的演講。然而，由於安全考量，校方在活動前夕取消了他原訂在校內的現場演講。最終，該活動轉移至其他地點舉辦，並以直播形式在大學內播放。Albanese 因其對以色列在加薩地區行為的批判立場，遭到德國多位政治人物與媒體的攻擊。柏林市長、柏林市政府負責科學事務的參議員，以及以色列駐德國大使，皆施壓要求校方取消此次活動。以色列大使甚至指控該演講是「哈馬斯支持者的訓練營」。德國媒體亦加入報導譴責，形容 Albanese 為「受到國際廣泛批評、極端仇恨以色列的狂熱份子」。事實上，早在此活動一週前，慕尼黑大學（the 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便已基於類似理由取消 Albanese 的另一場演講。對於接連不斷的取消與施壓行動，Albanese 表示：「我從未見過有哪個國家的大學如此全面地在政治壓力下屈服。」

> 沈默的異議者

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以來，作為全球聲援巴勒斯坦、反對加薩種族滅絕社會運動的一環，德國也出現了高度動員的抗議行動與公共表達。然而，這場運動在德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壓制。根據政治社會學與社會運動研究的文獻，「噤聲」可理解為一種有系統地壓制、邊緣化，或使批判主流敘事與權力結構的聲音失去合法性的過程。這種壓制往往透過制度、法律、政治或語言等手段實施。截至目前，已有超過200件公開報導的取消事件，包括學術講座、研究邀請、文化活動、藝術表演、電影放映、甚至獎項頒發。街頭抗議也遭遇警察暴力，柏林更曾禁止在示威中使用阿拉伯語。

本文聚焦於在德國學術界與公共領域中，反猶太主義如何被政治性地工具化，成為壓制批判以色列政策與聲援巴勒斯坦言論的手段。我們特別強調一項機制：將特定、策略性建構的「反猶太主義」定義作為一種模糊而靈活的工具，以合法化各種形式的「沉默化」。社會學家 [Donatella della Porta](#) 將當前德國的反猶政治爭議描述為「道德恐慌」，而 [Peter Ullrich](#) 則稱其為「專制的反猶太主義」。這些概念共同指出：反猶太言論或行為的指控，已在意識形態、政治與策略層面，變成了一種噤聲的武器。這種噤聲機制根據具體脈絡，在不同場域中以多樣化方式運作。我們並不否認德國存在反猶太主義。這一問題深深植根於德國歷史，也形塑了其反法西斯與反種族主義的鬥爭傳統。然而，我們所關注的是：當「反猶太主義」的標籤被一體適用地加諸於所有批評以色列政府、聲援巴勒斯坦的言論或行動時，批判性言論與政治表達便遭到壓制。這種不加區辨的指控阻礙了對戰爭罪行、種族滅絕、人權侵害，乃至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及其人民所實施的有害政策與結構性暴力的誠實討論，進一步扼殺了德國社會中極需公開、坦率與多元的辯論空間。

> 為什麼要噤聲？

許多來自德國以外的觀察者對於德國社會普遍缺乏對「反猶太主義」作為噤聲工具之濫用的警覺與抵抗，感到困惑。事實上，將「反猶」指控用於壓制異議的情形在其他國家也屢見不鮮，其中尤以美國為甚。然而，德國的情況具有其獨特性。

首先，這種特殊現象可部分從德國對大屠殺歷史的回應以及其與國族認同與國家制度的連結中理解。作為對納粹罪行的歷史責任之一，德國將打擊與預防反猶太主義視為國家首要任務。這種承諾深植於其法律框架、政治論述與教育制度之中，並將「以色列國家的安全」與德國的「國家理性」（Staatsräson）緊密相連。

其次，這樣的制度性建構也塑造了德國社會的價值觀與認同模式，形成一種特殊的「道德自我」意識。部分德國左翼甚至採取所謂「[反德意志](#)」（[anti-German](#)）立場，認為德國的國家身份與其法西斯過去密不可分，進而將無條件支持以色列視為歷史贖罪的一部分。在這種脈絡中，任何對以色列政策的批評都容易被視為反猶太的表現。這種由歷史罪責驅動的集體記憶文化，導致了德國諸多機構、公共媒體與公民社會，在跨越政治立場的情況下，對以色列政府展現出幾近無條件的支持，使得細緻、具批判性的辯論變得困難。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國內的極右翼勢力——儘管其本身是當前反猶太主義的主要來源之一——卻也積極支持壓制聲援巴勒斯坦的言論與行動。這一策略性的立場為他們的反移民、反阿拉伯以及恐伊斯蘭的種族主義政策提供了掩護，使得針對穆斯林與其他少數族裔的歧視言論與行為得以在「保護猶太人」的道德語境下獲得正當化。

最後，主流社會中仍有許多人，雖不明確隸屬任何特定的政治立場或團體，卻因為擔憂「說錯話」、被

誤解或遭到指責，而選擇沉默。這種沉默不僅源自制度與輿論的壓力，也來自於對言論風險的真實恐懼。此外，從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德國與以色列之間的緊密關係，並非僅僅出於歷史責任，而是建立在長期穩固且具高度利益的經濟與軍事合作基礎上。德國是以色列在歐洲最大的貿易夥伴，雙邊關係涵蓋廣泛的投資與產業鏈合作。數十年來，德國也是以色列的第二大武器供應國，且從 2022 年到 2023 年，德國對以色列的武器出口量大幅上升，使本國軍事工業從中獲益匪淺。兩國的[軍事合作歷史悠久](#)，且持續擴展中。

在這樣的結構背景下，主流媒體普遍缺乏開放的辯論與批判性的報導。關於以色列的新聞報導往往呈現出不對稱與帶有偏見的敘述，對巴勒斯坦人的處境、苦難與死亡則經常被淡化、邊緣化，甚至完全忽略。而任何聲援巴勒斯坦或關注其人權處境的言論，則時常被貼上「反猶太」、「[哈馬斯支持者](#)」或「[仇視以色列者](#)」等標籤，進一步削弱了公共討論的空間與正當性。

> 在德國，反猶太主義被建構為一種靈活而模糊的鎮壓工具

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提出的[反猶太主義工作定義](#)，為「反猶太主義」作為壓制工具提供了合法性依據，並被德國各類機構廣泛採用。這一定義長期遭到批評，認為其對「何謂反猶太主義」的界定過於模糊，導致幾乎所有對以色列國家或猶太復國主義的批判，都可能被視為反猶太言論。由多位學者與法律專家撰寫的《[耶路撒冷反猶太主義宣言](#)》（Jerusalem Declaration on Antisemitism）中明確指出，IHRA 的定義缺乏區辨「真正的反猶太言論」與「針對以色列政策的合法批評」的能力，容易被政治與意識形態力量策略性地濫用。這種模糊性已在德國體制中制度化。

德國議會近期通過了兩項政府決議，並獲得所有主要政黨一致支持：其一為 2024 年 11 月 7 日的「永不再來——保護、維護並強化德國猶太人的生活」；其二為 2025 年 1 月 30 日的「打擊學校與大學中的反猶太主義與對以色列的敵意（Israelfeindlichkeit），並確保自由論述空間」。這兩項決議要求公共機構，特別是學術與文化單位，依據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的反猶太主義定義，識別相關言論與行為，並授權建立制裁機制。第二項決議尤為關鍵，明確列出制裁措施，包括禁止支持或參與「抵制、撤資與制裁」（BDS）運動及類似行動的個人與活動。IHRA 的模糊定義正被用作打壓異議的合法化工具，尤其針對大學校園，使其成為政策打壓的主要場域。

包括國際特赦組織在內的多個國際人權組織，以及學者、律師與研究反猶太主義的專家，均對這兩項決議嚴厲批評，認為其對學術自由構成重大威脅。這些決議表面上以「保護猶太人的生活」為名，實則成為壓制知識交流與建構的專制工具。更令人擔憂的是，它們為未來政治力量干預教育領域開啟了先例，例如將對國內外學者的反猶太主義指控「定性化」的做法常態化。此舉不僅會加劇自我審查與寒蟬效應，也將嚴重限制德國大學與國際學術界之間的自由對話與合作。值得注意的

是，《國際人權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Ken Stern](#) 近期公開表示：「該定義的設計初衷並非用來作為抑制或冷卻大學校園言論的工具。」

> 學術界的沉默以對

一份由[沉默檔案](#) (Archive of Silence) 記錄的清單，整理了與支持巴勒斯坦立場有關的公開事件，包括講者邀約、會議與工作坊的取消、學術職位的撤銷，以及研究獎助金的中斷。例如，科隆大學取消了哲學家 Nancy Fraser 的客座教授職位；英籍巴勒斯坦外科醫師、格拉斯哥大學校長 Ghassan Abu Sittah 博士則遭到禁止入境德國。然而，這些公開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發生在幕後的、非正式且未公開的噤聲行為，迄今仍難以系統性地記錄與追蹤。在德國各地大學中，噤聲似乎已普遍存在，學者之間經常私下交流彼此在不同院校所目睹或經歷的案例。以下是一些來自希望匿名的受訪者分享的具體例子：

- 一位研究員因簽署一封呼籲對加薩提供人道援助的公開信，遭教務長告知有匿名家長（據稱為猶太學生的家長）投訴其「反猶太」，對猶太學生構成安全威脅。該研究員為保住合約，被迫撤回簽名。
- 一位客座教授因擔心校方干預與媒體反撲，選擇不邀請持親巴立場的講者。
- 一部巴勒斯坦紀錄片的放映被以「安全考量」為由取消。
- 一場關於（解）殖民主義與巴勒斯坦議題的講座系列，因可能涉及仇恨言論，未獲校方批准。
- 大學高層干預校園中討論「抵制、撤資、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簡稱「BDS」）運動的活動安排。
- 一位研究種族滅絕的學者被禁止在課堂上使用「定居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一詞，理由是這個詞可能引發學生情緒上的不適。

這些案例的當事人幾乎全是處於不穩定聘雇狀態的學術人員，例如博士生、博士後研究員與非終身職教授，其中多數還是非德國籍。普遍而言，噤聲的理由往往來自對媒體曝光的恐懼，或是對學生情緒反應的過度預設。

有些大學已成為學生抗議行動的焦點。部分大學領導層曾要求警方以武力驅離校園內的示威學生，亦有數所大學對學生提起法律訴訟，使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並導致學生被處以罰款。像是漢堡大學（University of Hamburg）與柏林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等校，已明確禁止學生在校園內進行抗議活動。[德國媒體](#)，尤其是通俗小報《BILD》，則對大學施加壓力，要求撤換那些在支持學生抗議權利的公開信上簽名的教授，並將這些教授貼上「反猶太仇恨言論者」的標籤。在一個罕見的案例中，柏林的愛麗絲薩洛蒙柏林應用科技大學（Alice Salomon Hochschule）校長拒絕報警驅散參與抗議的學生，結果被媒體指控未履行保護教職員與學生的責任。保守派政治人物更進一步[要求他辭職](#)。最近，在 2025 年 4 月，柏林移民局對四名非德國籍學生啟動[驅逐程序](#)，理由是他們曾在大學校園內參與抗議行動。

> 街頭抗議中的沉默

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起，反對加薩種族滅絕的抗議活動迅速蔓延至全球各地，包括德國。參與者涵蓋多種團體：社會運動參與者、非政府組織、草根運動、和平倡議者、國際人權及團結組織（其中包括猶太人團體），以及德國的反種族主義與親民主派系。然而，這些街頭抗議活動因被貼上反猶太主義標籤而遭受嚴厲鎮壓，包括警方的強力實體壓制與地方政府的法律限制，且此類措施常獲得通俗小報與部分主流媒體的支持。

柏林作為歐洲擁有最多巴勒斯坦散居人口的城市，於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0 月間爆發了逾百場抗議活動。抗議者遭遇防暴警察的嚴厲對待、人身暴力、逮捕及禁令。警方屢次採取升級策略，導致[數百人被捕](#)（包括兒童），並以煽動、恐怖主義嫌疑和支持哈馬斯等罪名起訴。在部分案例中，這些指控進一步造成對於非公民的人們之遞解出境程序。

當局運用多種策略壓制抗議行動。2025 年 2 月，柏林地方政府禁止抗議口號及標語中使用阿拉伯語，並禁止使用鼓聲，意在確保警方能聽見阿拉伯語歌曲。部分媒體，如通俗小報《BILD》和《BZ》，不僅支持此語言禁令，還呼籲採取[更嚴厲的鎮壓措施](#)。[阿拉伯語被污名化](#)，且被描繪成為了「宣傳罪行」的語言，進一步激化反穆斯林與反阿拉伯情緒。

嚴厲鎮壓的背後，其實是被廣泛運用的反猶太主義，並以此合理化對示威者的暴力與壓制，卻掩蓋了當地深層社會背景。以柏林為例，許多抗議發生於新科隆區（Neukölln）與克魯茲伯格區（Kreuzberg），這兩地區聚居大量阿拉伯移民，長期以來是激進主義與政治動員的重鎮。由於移民人口眾多，這些區域經常被標籤為「問題區域」，警方與示威者間的衝突歷史悠久。當局針對這些抗議的鎮壓，不僅限縮了集會自由，更強化了種族化治安體系，並擴大了國家對異議聲音的監控與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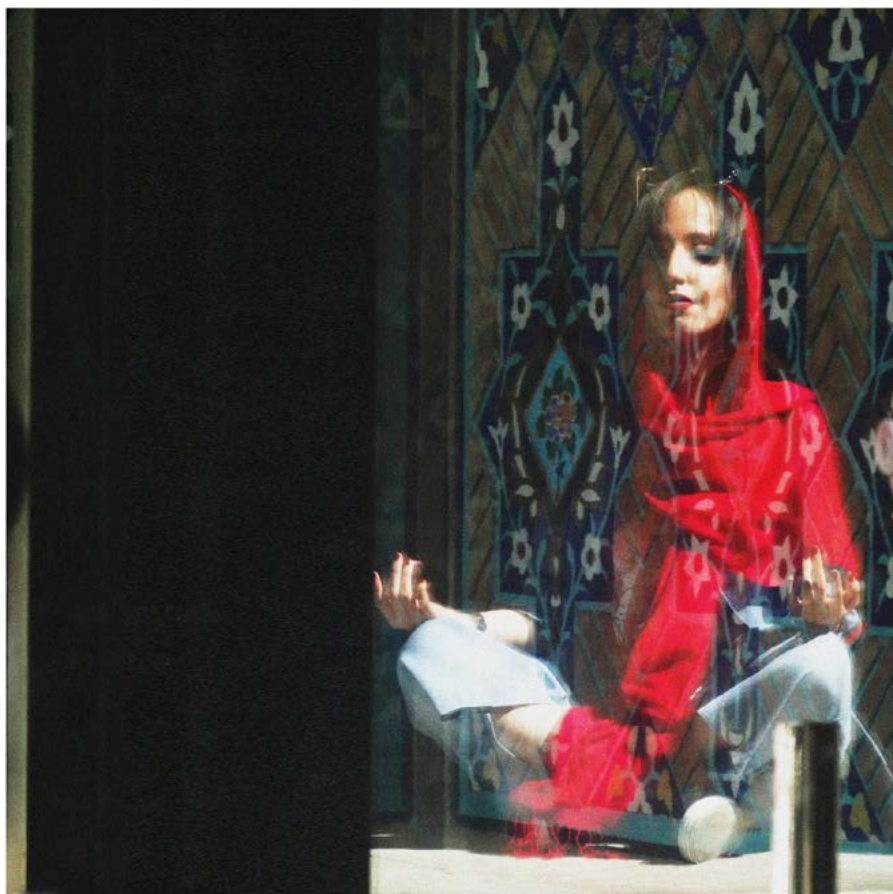
> 反猶太主義的工具化

反猶太主義的工具化涉及重大利害關係：它被用來壓制對以色列政策、軍事行動及種族滅絕的合法批評，在德國助長了一種日益專制的社會與政治氛圍。這種現象，影響了相當多的層面：首先，它使政治意識形態滲透研究與教育領域，對學術自由構成直接威脅。其次，它對集會與抗議權利實行雙重標準，將移民社群——尤其是講阿拉伯語的群體——標籤為犯罪者，從而在德國社會中加劇反穆斯林與反阿拉伯的種族主義氛圍。這一現象也助長了極右翼勢力的正常化，使其得以轉移公眾對自身極右反猶太主義傾向的注意力。因此，反猶太主義的政治化成為一種噤聲的工具，不僅阻礙了針對真正反猶太主義的有效打擊，也限制了德國內部對種族主義、仇外心理與反猶太主義的實質討論。

這種在種族、仇外和反猶太主義面向嚴重受限的論述空間，替未來進一步壓縮公民社會自由開創了危險先例。反猶太主義作為一種多面向，且策略性部署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噤聲工具，將德國推向一條危險的道路，可能加劇其國際孤立。這樣的現象，也令人聯想到「德意志特殊道路」（德語：German Sonderweg，英文：German exceptionalism）的歷史陰影。在當前全球脈絡下，德國的發展既是一個警示，也是行動的號召——強調必須保護言論自由、抗議權利與研究調查的精神，以維護全球正義的核心價值，並共同抵抗遍布各地的戰爭與種族滅絕行徑。■

> 破碎的城市： 對伊朗反女性都市主義的批判

Armita Khalatbari Limaki，獨立研究者、建築師與設計師，伊朗



紅領巾，德黑蘭尼亞瓦蘭宮殿群，2014 年。
出處：Armita Khalatbari Limaki。

要處理女性在城市發展中的地位，以及她們在重大城市決策過程中隱身的問題，需要進行全面性的辯論，特別是在一個具有宗教法律的國家背景下。這篇短文將觸及在這種情境中對女性所造成的不平等案例，並深入探討人們的生活方式與法律文件上所記載內容之間的明顯落差。我的研究方法本質上是理論性的，透過批判性的視角，我旨在探討女性、城市空間與社會正義在特定文化框架下的複雜交織關係。

> 沒有任何標誌能喚起女性的環境氛圍

大約二十年前，伊朗提出了一項名為「女性專用公園」的都市計畫，其構想是為了強化女性在公共空間中的自由與社會活力。該計畫的目的是透過劃設特定的城市公共空間給女性使用，來營造安全與舒適的感受。這些公園設計有繁茂的綠樹、噴泉和繽紛的花卉，然而，

當時施行的法律卻傳遞出完全不同的觀念，與休閒空間的基本目標背道而馳。因此，除了少數想要在這些公園中出現的個人外，大多數女性都認為這些空間中的安全與平靜是一種人為且不真實的構造，是透過壓迫且不公的過程強加於她們身上的。

這項計畫失敗並缺乏吸引力的原因，源於一個錯誤的前提——也就是認為某些本質上無法分割的事物，其實可以被切割開來。有些特質是無法被限制在特定空間中的；這些特質必須流動於城市的基因之中。然而，當試圖將如此具動態性的特質指派到某個特定地點，並幻想能夠捕捉那些不斷變動的事物時，最終只導致一種疏離感，因此也就注定失敗。正如同在城市中不需要任何標誌或標籤就能喚起一種陽剛氛圍一般，僅僅在公園入口處設立一個標示，也無法營造出一種女性的環境氛圍。

> 將無形且流動的特質限制在界線之內， 會導致情感的破碎與分裂

當公共空間的配置被用來在城市某些特定區域中營造活力與熱情時，類似的問題就會浮現。我並不是在否定為不同用途進行土地分區的做法本身有什麼根本性的錯誤。我所指出的是一個更根本的斷裂，也就是一種更深層的「情感分區」——這是一種既必要又無所不在，卻從根本上無法被界定或限制的概念。像是滿足、喜悅、通透性、以及對環境的熟悉感等特質，這些被視為健康城市的基本要素，並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範所左右。

當空間系統透過將這些無形且流動的特質劃分到特定地理區域中時，我們並非將它們視為城市景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來享受，而是只允許它們在有限的範圍內展現，最終導致一個無效且不完整的結果。這種做法等同於默許城市應被切割成若干片段，並對每個片段期待特定的表現形式，而不容許它們超越其界線。

因此，儘管隨著公共公園與休閒中心的擴展，「愉悅生活體驗」的總量有所增加，但在這種情況下，整個城市中無法形成連貫的情感景觀。反而會出現分散在城市各處的零散式情感，彼此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連結，市民只能被迫在特定地點尋找並內化這些情感，才能感受到那份情緒。最終，在這樣的環境下，無法期待人們展現適度的行為，而要達成集體的滿足與安適幾乎是不可能的。

> 一座城市永遠反映其居民的樣貌， 而這些居民無法被自上而下的階層式規劃所改變

我此處批判的對象，是那些旨在減少現實混亂的決策，因為這些決策反而加劇了原本的困境。當它們優先追求視覺上的秩序，而忽視生活內在的秩序時，儘管本質上帶有規訓性，卻與法律和傳統契約等既熟悉又合理的模式一同製造出一種新的緊張關係。事實上，正因如此，[忽視人類行為動態特性](#)的僵化且靜態的分區規劃注定會失敗：它們要麼成為展示和放大罕見特質的儀式，要麼是逃避責任的手段。

這種階層式的體制在面對社會不平等時保持沈默，且似乎試圖以一個固定且單一的標準來衡量所有個體，最終導致社會分裂成不同階級的片段。有些人對強加於他們的秩序感到滿足，而另一些人則被排除在外。在這樣的情況下，貧窮成為難以解決的問題，行為暴力、犯罪與違法現象變得司空見慣，而普遍的滿足感則成為罕見且珍貴的寶石。

這意味著，由個體所處的物理位置所決定的階層結構，首先會逐漸影響一個人的心理狀態。事實上，[這些城市規則應該先與城市中現有的文化規範](#)、價值觀和社會準則相契合，而不是期待城市去遵從那些陌生的指令。因此，儘管法律與規章對於控制城市發展是必要的，但若缺乏對承載社區獨特特質的存在意義與承諾，這些規則將變得無效且毫無價值，使文化轉型成為不切實際的期待。■

來信寄至：
Armita Khalatbari Limaki
<armita.khalatbari@yahoo.com>

